

記憶

REMEMBRANCE



迟群（1932-1999）山东乳山人，49年参军，文革时任8341部队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68年7月随军宣队入清华，任校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69年9月任北大革委会常委，71年5月任中共北大委员会常委。“梁效”写作组负责人之一。76年10月被免职，83年获刑18年，刑满释放后，病亡。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6年5月15日第9期 总第155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155期

北京大学文革专辑（9）

目录

【专稿】

章 铎 从高云鹏的遭遇，看迟群之流的专制

附：高云鹏给胡宗式、章铎的信(2015年11月19日)

【评论】

马云龙 王复兴《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序

扬子浪 洗涤我们被污损的灵魂——读《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

【述往】

王复兴 《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摘选）——1966年：文革爆发

张 甦 南下串联与贵州文革（一）

【资料】

1. 康生批驳北大技物系崔子明等的两封反动信件（1967.1.3）

2. 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北京大学代表谈话纪要（1967.1.3）

3. 陈伯达、江青同志做重要指示（1967.1.16）

【读者来信】

1. 庄菁瑞、佐燕、郭力、季焜谈非正常死亡一文 2. 冯永光转来两封读者来信

3. 越人谈林彪的四大马屁 4. 岳瑞民谈《北师大文革大事记》 5. 蒋健正误

6. 赵惠中纠错 7. 刘明评《记忆》154期 8. 胡拾音修正补遗北师大文革大事记

【本刊声明】

【专稿】

从高云鹏的遭遇，看迟群之流的专制¹

章 铎

引言

1970年1月27日，北大哲学系孙蓬一、赵正义、宋一秀、高云鹏、韦全贵等五位教员贴出了一份题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彻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大字报（以下简称1.27大字报）。大字报列举了若干发生在北大的现象，怀疑同“五一六”有关，认为应该进行调查。

这张大字报出现的历史背景，显然同当时中央发动的大规模清查“五一六”的运动有关。1970年1月24日，周恩来、康生、江青在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军宣队代表时作了长篇讲话，这些讲话把王、关、戚，以及吴传启、林聿时、潘梓年一伙都称之为“五一六”，说他们组织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²列举了他们的种种罪行。讲话还点了许多其他人的名字。这些讲话在许多单位作了传达，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掀起了一个清查“五一六”的高潮。另外，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也在1月中旬作过两次讲话，披露了周景芳³一伙把持北京市革委会多个部门，干了许多坏事的情况。

¹ 高云鹏被打击迫害，发生在1970年2月以后，此时老五届已离校或将离校，对此一无所知。近几年，我们试图弄清楚高云鹏被迫害的情况，又怕伤害了他，直到他表示“我应该说清楚的我一定要说清楚，还历史以本来的面貌，不然我死也不会瞑目”后，我们才了解到他的相关情况。此文的主要内容应该看成是高云鹏的自述。

² 有关“五一六”问题的文章和论述很多，限于篇幅，兹不赘引。简而言之，在北京确实存在过的，只有一个以钢铁学院学生张建旗为首的“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另外，北京外语学院有一个叫“六一六”的组织，两者都是反对周总理的，且互有联系。至于1970年开始在全国大规模清查的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参见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人民出版社，2009年 第198—199页），另请参见王广宇（曾任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撰《“五一六”反革命案发生的真相》（载阎长贵、王广宇著：《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年，第149—157页）。在这场运动中，有数百万人遭到残酷迫害，上千万人受到株连。据王广宇先生回忆，在“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写好了多篇攻击周总理的大字报，但还未张贴的时候，中央文革记者站的通讯员就向中央文革作了报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谢富治正在开会，“电话记录”在与会人员中传阅了一圈，但没有任何人表示态度，所有的人都态度冷淡，不置一词。所以，“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攻击周总理的大字报实际上就是在中央文革和谢富治等人的纵容下贴出来的。（王广宇：《“五一六”反革命案发生的真相》）

³ 周景芳，中国科学院哲学与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哲学所研究人员，1967年4月至9月，任中共北京市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兼秘书长，并任市革委会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

早在1967年4月10日，聂元梓、孙蓬一就向陈伯达、江青进言，当面提出了关锋、王力结党营私的问题。4月12日，孙蓬一在北大的群众大会上讲话时，公开提出学部吴传启¹一伙居心叵测，正利用文革之机结党营私，应该予以揭露。4月13日孙蓬一发表了对谢富治不满的讲话，引发了一次“炮打谢富治”的事件。孙蓬一的两次公开讲话产生了广泛而严重的后果，对中央文革造成了威胁，于是就遭到了中央文革的打压。中央文革使用威胁、利诱的手段，企图迫使北大放弃揭发吴传启的行动。在这些手段失败以后，陈伯达1967年6月5日讲话严厉指责聂元梓、孙蓬一，扼杀了北大继续揭发吴传启的行动，并在北大挑起了内乱。1967年8月底，关、王垮台。1968年1月，戚本禹也倒台了。

在很长的时间里，王、关、戚和吴传启等一伙人到底搞了哪些阴谋活动，到底查清了什么，王、关、戚的背后还有些什么，老百姓都一无所知，也无从猜测，很是郁闷。这也是孙蓬一等人 and 北大许多人关注的问题，是他们的一个心结。人们很希望能揭开王、关、戚一伙的黑幕。现在，中央领导人突然作了这么长篇的讲话，揭示了许多前所未闻、令人惊悚的事情，社会上反响巨大。北大的人，如孙蓬一等，当然感到非常震惊。北大早在1967年初就开始反对关锋、吴传启一伙了，但绝对没有想到这些人竟然还是“五一六”。过去，北大一向是把王、关、戚、吴传启一伙同张建旗那个“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严格区分开来的，称前者为“反党集团”，称后者为“五一六”。两者在行事和思想方面虽然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并不是一回事。²这一次说吴传启一伙也是“五一六”，还组织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当然令人震惊了。当然，孙蓬一等人绝对没有认识到，这一次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已经严重的扩大化了。他们更不会想到，他们自己实际上早已是这场运动的对象了，只是当权者还没有准备好，还在等待时机。

¹ 吴传启，学部哲学所研究人员，文革中是学部群众组织“联队”的核心人物，是关锋在社会上的一派势力的代表人物。

² 1967年，北大所了解的“五一六”，是以张建旗为首的“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新北大公社动态组负责人胡宗式获悉他们贴出攻击周总理的大字报并散发传单的情况后，立即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作了报告，并按指示将相关材料转交给总理办公室。另据北大校友告，北大《除隐患》战斗队对“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进行了调查。调查表明，这是一个很小的组织，虽然号称有八个“方面军”，但人数不过一二十人。这是一小撮在“反二月逆流”浪潮中冒出来的极端分子，他们只攻击周总理和几位被认为是“二月逆流派”的副总理。受条件限制，北大的调查很有限，但未发现该组织成员同吴传启一伙有组织上的联系。

当很多单位按照党中央的指示清查“五·一六”时，北大宣传队领导小组却认为：我们宣传队一进校就批判了极左思潮，早就紧跟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现在我们学校不搞“五·一六”。外单位搞，我们要大力支持，但我们不参加，我们现在搞教育革命也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¹ 对宣传队的这种看法，当时有很多人表示不理解。

我们无从了解宣传队当时这样做的背景和理由。倘若宣传队真是这么认识的，并且真的坚持这样做了，那么，应该说他们做的是正确的。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并非如此。

北大是一个深受王、关、戚祸害的地方，北大于1967年6月1日贴出了一张揭露吴传启历史问题的大字报，就招来了陈伯达严厉的6.5讲话，若不是关、王垮台，聂、孙和北大校文革，以及新北大公社，恐怕在1967年就被压垮了。所以，孙蓬一等人贴大字报要求在北大清查“五一六”，在当时，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对于整个形势，对于包括王、关、戚和吴传启等一大批人在内的“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如何查出来的，对于这一次大规模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背景和内幕，显然一无所知。（直至今日，笔者对此依然感到困惑和不解。）鲁莽的孙蓬一等人没有汲取1967年4月12日公开讲话引来严重后果的教训，贴出了1.27大字报。他们没有认识到，文革的群众运动早已结束，现在北大的当权者是迟群等人，²他们带着耀眼的光环进入北大，北大已成为他们的天下，他们自认为手眼通天，故而作风霸道，说一不二，群众中若再有人提什么意见和看法，对他们说三道四，那就是对其权威的挑战，就是大逆不道，就得除之而后快。

何况，1.27大字报本身缺陷甚多。首先是盲目跟信当时中央发动的清查“五一六”的运动，不知道其中暗藏危机。这场运动的目标已经不是王、关、戚及其后台，而是指向群众的，包括反对过王、关、戚的干部群众，范围非常广泛。其次，孙蓬一等人盲目跟信的结果，使自己对“五一六”的认识偏离了原先比较符合实际的轨道，一些似是而非、并无确实证据的现象被拔高了，当成了“五一六”的表现。第三，大字报语气激烈，上纲很高。

¹ 有几位宣传队成员的讲话记录表明宣传队有这种看法。

² 迟群（1932-1999），8341部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1968年随军宣队进驻清华大学，先后担任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和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他和谢静宜是毛泽东派出接管清华、北大的红人。

于是，这张大字报立即成为打击的靶子。孙蓬一等人一下子撞到了枪口上。

1.27 大字报贴出以后，很快遭到迟群一伙的严厉打击。迟群等人认为：“大字报的要害就是要翻案，要夺权”，并发动全校师生员工对大字报的作者进行围攻、批斗。孙蓬一后来被戴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¹高云鹏拒不承认大字报是夺权，不写检查，遭到了迟群一伙的诬陷和残酷迫害，后来又因为拒绝作伪证陷害聂元梓，差点丢掉性命。

本文仅就高云鹏的遭遇做一简要介绍，对迟群一伙的倒行逆施和卑劣行径稍作揭示。

1、1·27 大字报前的高云鹏

高云鹏是哲学系教员，1937年出生。他是“第一张大字报”和“1.27 大字报”的作者之一。1966年9月，北大成立了校文革，高云鹏经全系群众选举当选为哲学系文革主任。

按照当年“战备”的需要，北大在文革前的1965年就开始在汉中兴建分校（即1965年教育部三线建设的第三号工程，简称653）。北大653分校的建筑单位是建工部五局四公司，文革中在当地属于“统派”。早在周培源（副校长）、戴新民（技术物理系党总支书记）负责分校工作的时候，分校的北大师生就是支持汉中“统派”的。为此，周、戴二人经常遭到对立派“联新派”的围攻。有一次，戴新民前往汉中军分区办事，途中被“联新派”围在吉普车上两天没能出来。在这种局面下，周培源、戴新民派人回学校让聂元梓派人去帮助他们。回校的人曾直接找到高云鹏，动员他去汉中。高云鹏成了校文革派往653分校的合适人选。去汉中之前，聂元梓交待高云鹏的任务是：动员技术物理系、无线电系、数力系参加汉中文革的同学（大概有七八十人）返回北京，脱离当地的文革。高云鹏于1967年5月下旬到达汉中，很快便动员了大多数同学回京了。

高云鹏到汉中是周培源接待的，但是，相处才一个星期，周培源就对他说道：“我和杨成武很熟，我要到北京找杨成武，让杨成武采取措施，解决分校存放的放射性物质的问题。

¹ 参见《记忆》139期专稿 章铎：《我所了解的孙蓬一》；或参见胡宗式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ef67570102wahc.html

我一个星期，最多两个星期就能回来，你在这个期间把分校的工作管好。”高云鹏认为，保护放射性物质的问题确实很重要，急需解决。钴 60 就放在学校西南角的馒头山上，没有任何防护偷盗的设施，分校又在汉江、褒河交汇处，万一被坏人偷去，投到江河里去，受害的将是长江中下游这么大大一片土地。责任谁也负不起。这是件大事、好事。他对周培源是信任的，所以就答应了。但是周培源离开汉中后却未见回来，而且一再联系都联系不到他，派人到学校找也没找到。后来才知道，周培源参加了“井冈山”，并当了“井冈山”的头头。再往后，周总理让周培源脱离群众组织，他就彻底隐蔽起来了。国家当时在分校的投资达数千万元，相当于现在的几十个亿，高云鹏哪敢放弃不管擅自回北京呢。

高云鹏对我们说：“周培源不回来，学校不派人来，我就不能离开分校。这时我的责任就是组织分校人员保护国家财产。好在我在分校期间，分校人员没有参加汉中武斗的，分校的财产（房屋、设备、钢材、木材、水泥等建筑材料）没有受到损失。不像其他三线建设单位（上海第一机床厂、北京第二机床厂、哈尔滨海红轴承厂等），人员跑光了，除了房子没被抢走，其他物资都被抢劫一空。后来校文革派了唐春景（地质地理系学生、校文革常委）来，我才回到北京。”¹

1967 年底回到北京后，高云鹏到哲学系继续参与系文革的工作。3.29 武斗之后，北大的局面十分紧张。聂元梓找高云鹏个别谈话，她说：“学校近来发生不少事，公社都是些年轻人，做事比较莽撞。你到 44 楼（新北大公社所在地——笔者注）去把把关，别让年轻人太莽撞做出出格的事情来。”² 这样，高云鹏在 4 月份到了 44 楼。高云鹏到 44 楼不久，就发生了地院附中的学生温家驹被打致死事件，时间是 1968 年 4 月 19 日。

2015 年 9 月 22 日下午，我和胡宗式拜访了徐建忠³夫妇，徐被同学戏称为高云鹏的“保镖”。徐建忠说：“高云鹏到汉中分校动员北大的同学回校，不参加汉中的文革。除留守人员外，我们于 1967 年底都回到了北大。1968 年武斗高潮时，聂元梓动员高云鹏坐镇文

¹ 高云鹏 2015 年 9 月 3 日来信。

² 高云鹏 2015 年 9 月 10 日来信。

³ 徐建忠，技术物理系 65 级学生，夫妇二人都是北大校友，均为原宝鸡凤翔师范（后并为宝鸡职业技术学院，简称六校）退休教师。因为我们相距很近，现互有往来。

攻武卫指挥部，高云鹏让我跟着他，外出时，他到哪我跟到哪。他有事，我就跟着他，没有事，我就在44楼睡觉。我们到了44楼后，没有遇到什么大的武斗，所以到44楼的时间肯定是在3.29武斗之后，但具体是哪一天，我不记得了。”

1968年4月25日，井冈山强行占据了36楼。4月26日，孙蓬一主张攻打36楼。高云鹏认为：硬冲是要伤人的，不能让公社的同志们豁出命来达到目的，不能下这个决心。但孙蓬一已经直接组织人员上了阵，结果公社伤了不少人。后来孙蓬一还是接受了高云鹏的意见，将攻楼的队伍撤了下来。

1968年8月19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以聂元梓、孙蓬一为首的校文革结束了领导北大文革运动的使命。不久，宣传队派高云鹏到汉中主持分校工作，任汉中分校领导小组组长。1969年底，他从汉中回到北京，休息一段时间后回到哲学系。宣传队对高云鹏在汉中的工作成绩比较肯定和重视，想安排他到学校工作，但高云鹏没有答应，遂让他负责哲学系老教授们（冯友兰、任华、唐钺等）的学习。

2、高云鹏不承认1.27大字报是反党，遭陷害

1970年1月27日，孙蓬一、赵正义、宋一秀、韦全贵写了一张大字报，希望高云鹏签名。在大字报贴出来之前高云鹏在上面签了名。不几天，迟群等人就把大字报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工人阶级”。宣传队组织了对大字报的围攻，并对写大字报的几个人展开了批判，大会、小会不断。孙蓬一、高云鹏等人坚持不认错。为了彻底打垮大字报的作者，宣传队就盯上了高云鹏。他们认为高云鹏年轻，不像孙蓬一那样难对付，加上一个大罪名，他一定会投降，完全听任他们的摆布。他们企图通过高云鹏揭出校文革、聂元梓幕后的秘密，为彻底批倒聂元梓、孙蓬一提供炮弹。为此，他们派哲学系宣传队一个姓郑的军人到汉中收集高云鹏的材料。他用诱供的手段，编造了“高云鹏是汉中8.19炸楼事件主犯”的谎言。迟群们认为，把“炸楼主犯”这么大的罪名加到高云鹏的头上，他一定

会屈服的。但是，高云鹏没能让他们如愿。

高云鹏说：“北大宣传队为了整我，派人到汉中搜集我的材料。他们找到一个姓蔡的‘统派’小头头，这个人实际上并不是事件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他大概也不知道事件的真相。但是来调查的姓郑的人告诉他，这是个非常严重的事件，肯定会有人在后面支持你们，而且这个人也不会是一般的人物，你们把这个人揭发出来才能减轻你们的责任。姓郑的告诉他，自己是8341在北大支左的，可以帮助他。这样，他就编出了一个故事，说炸楼前有一个人来到他的办公室，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可以执行了。他说等一等，并拿起电话向接电话的人报告了这件事。打完电话他就告诉来人去干吧。这人走后不久就听到外边的爆炸声。我就是他电话请示的那个人。除了这个编故事的人以外，没有任何证明的人，包括他说的那个来到办公室请示他的人。宣传队拿到这样的材料就当成‘炮弹’来整我了。”¹

1970年7月27日 全校召开批斗高云鹏大会，揭发、批判他在炸毁汉中汉运司大楼流血事件（即1967年8.19炸楼事件）中的问题。会上，宣传队领导小组、校革委会负责人宣布了把高云鹏交由汉中地区人民批斗处理的决定。

1971年2月，胡宗式被押回北大接受审查。在被审查期间，他听说了高云鹏在1970年7月就被宣判“死刑，缓期二年”的消息。1971年2月26日，在办公楼召开第二次批判聂元梓大会，胡宗式参加了这次大会。批判会的中心就是汉中汉运司职工大楼被炸、死亡40多人的事件（笔者注：具体伤亡人数说法不一）。发言者说：“高云鹏就是这次炸楼事件的总指挥。他和聂元梓是什么关系呢？高是聂派去的，事前高和聂通讯频繁。8.19那天，高云鹏来电话一直请示聂元梓，聂说：抓住要害要狠狠地打。那边高就炸楼了。”

关于汉中8.19事件，徐建忠是这样描述的：“汉运司在北大街上，是交通要道，被对立派占领了，对‘统派’来回经过的人，他们用石头砸，当时那里的气氛很紧张。8月19日上午10点多钟，我跑到路南一座民房的顶上观看。我看到‘统派’的一辆车闯入后，就发生了爆炸，死了好多人。飞起的石头和一段水泥构件，落到我所在的房顶，险些把我砸

¹ 高云鹏2015年9月10日来信。

到。我赶紧跑下来，一直跑到高云鹏的住处，敲开房门，他在睡午觉。我问他，这一派把对方的楼炸了，你知道不？高云鹏说：不知道。我说，这么大的事也不商量一下。”¹

高云鹏被押回汉中关在汉中看守所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汉中方面并没有介入审查高云鹏的事情，都是北大宣传队的人找他谈话，并诱导高云鹏作伪证。高云鹏说：“我被抓到汉中后，开始汉中并没有把我当成炸楼案件的当事人，因为当时他们调查的结果并没有我参与炸楼的证据，所以很长时间汉中当局并没有找我‘审查’相关的情况。倒是原来哲学系宣传队的指导员，后来是校宣传队副总指挥的魏银秋，整天找我谈话，谈了一个星期。内容是引导我回忆北大文革中的一些事件，都是要给校文革、老聂强加罪名的。有一个要我‘回忆’的事件最具代表性。魏银秋启发我很久我都没有理解，后来他干脆告诉我：只要我配合他们‘搞清’一件事，明天就能放我出去，而且说他说话是算数的，是说一不二的。他要我说的就是40楼打死一个井冈山学生的事。情节要按他说的来‘交待’，即头一天晚上校文革在临湖轩开会，我参加了，会上老聂决定第二天让工人兵团到海淀镇去抓人。被打死的人就是这样被抓住打死的，事件是老聂策划的。我告诉魏银秋，我所知道的情况跟他让我交待的情节完全相反，事先校文革和老聂并不知道工人兵团在抓人。当天上午听说这件事之后，老聂和老孙的态度都是坚决制止的。直到工人兵团都撤回来之后他们还批评了有关人员。说这件事是老聂策划的不符合事实。我拒绝写这样的口供。魏银秋威胁我说，‘你不要命了？！’还说他们根据我前几天的交待把材料写了出来。我说你拿出这几天谈话的记录看看，都是你引导我时你自己说的，没有一句是我讲的！魏银秋说我是顽固分子，给我活路我还不走。我说正是因为你们要把我置于死地，我才非要说实话不可。我不能死了还给党找麻烦，对党不忠诚。就这样通过我陷害聂元梓的目的没有达到，但他们在北大却已达到了制造虚假舆论的目的。”²

1970年下半年以后，高云鹏一直被关在汉中看守所里。高云鹏说：“开始时，把我单

¹ 2015年9月22日拜访徐建忠夫妇的访谈记录，徐建忠已经审阅。

² 高云鹏2015年9月10日来信。

独关在一间屋子里，有两个人陪我住，外边 24 小时都有值班的，随时打开门上的窗户监视着我的动态。或者我是个特殊人物，或者问题严重，不然不会下这么大的功夫。我面临的形势是非常危险的，这我能感觉到。魏银秋就对我说：你的问题很严重。问我是想死还是想活。如果想活就和他们合作，争取从宽处理。甚至说他们说话是说一不二的，只要我能配合，明天就能把我放出去。我拒绝诬陷别人，魏银秋就说：看来你是不想活了。我说正是因为你们要置我于死地，所以我才不能说瞎话，我死了，死无对证，我就更不能说瞎话给党找麻烦。我在看守所从心理到物质上都做好了处死我的准备。”¹

魏银秋们说：“还留着这样顽固不化的分子干什么？”汉中积极追随他们的人就说高云鹏就是 8.19 炸楼事件的决策者，先后两次往陕西省上报的卷宗都是要求判处高云鹏死刑的。但因为只有姓蔡的这一个人提供的证词，连他说传话的那个人都不知道这事，当然证据不足，两次都被省上打了回来。

3、 电信局的工程记录戳穿了迟群之流的骗局

汉中当局拟判高云鹏死刑的卷宗第二次被打回来后，为了寻找当时给高云鹏打电话的新证据，他们决定去电话局询问值班人员，让他们提供给高云鹏接通电话的证据（当时还是由电话局插接电话，而不是自动接通电话的）。没想到电话局的人说当时电话线都被割断了，根本就没有电话可接。为了查清电话线被割断的事情，就查看了当时的值班记录。

高云鹏说：“1967 年的工程记录清楚地记载着，8.19 事件之前三天，武斗地段的电缆线就已被割断，经过那里的电话线路都不通了。事故发生后，电话局值班人员曾去现场查看，发现电缆被割断了，因为那里武斗比较严重，他们不能接通被割断的电缆，回来后做了值班记录。武斗结束之后才去把电缆接通。这也是当时值班记录记载的。三年前的记录如果不查谁也不会去看它，但是三年之后却成了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武斗的时候那个姓

¹ 高云鹏 2015 年 10 月 13 日来信。

蔡的小头头是不可能给我打电话的，我住的地方也不会接到电话，所以电话请示我的谎言就彻底被揭穿了。对我的诬陷自然也就不能得逞了。”¹

上述这些事情的内幕，当时高云鹏一无所知，只是到了1972年以后，对他的看守比较松了，甚至还让他在那里管理关押在看守所里的人，包括8.19事件的有关人员。高云鹏在汉中看守所总共被关押了6年多时间。

“四人帮”倒台后，汉中当局急于放高云鹏出去，但汉中分校和北大以各种理由让他待在汉中，不要回北大，并说北大很乱，回去对他不利。汉中方面把高弄到一个监狱（4号信箱）的就业队。他在这里住了3年左右。平时，他参与附近一个知青点的活动，因为要恢复高考，就带着这些孩子们复习功课。由于活动比较自由了，汉中当地的朋友经常到其住处来看望他。高云鹏对自己这些年的遭遇的内幕，都是这个时期听朋友们告诉他的。

高云鹏说：“事情彻底弄清楚之后就应该解除对我的审查了，但是北大以各种理由拖延问题的解决，不让我回到北大来。汉中革委会只好把我安排在一个保密的地方，既保证我的安全，也防止我和外界的联系。汉中和陕西省做了多次努力，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陕西省便采取果断措施，派人直接把我送回北京了。但是，当时由聂、孙专案组的人出面接待，以没有正常手续为由不予接收。结果陕西省的来人把我留在北京，他们回去后又按北京的要求发来一份汉中中级法院的判决书，宣告我‘无罪’。陕西为什么只拿省上的信件就把我送回来呢？因为把我送到汉中接受审查，并没有办理过任何法律手续，事情已经很清楚，当然他们就把我送回来了。北京要把责任推到汉中头上，所以一定要人家履行法律手续。汉中无奈，只得发来一份‘宣告无罪’的刑事判决书把事情了结了。我在隔离时和外界没有联系，上述有关8.19炸楼事件以及他们要处我死刑的情况都是后来知道的。1976年四人帮倒台之后我就比较自由，可以和外界有些联系了。这期间不少人给我讲述了8.19事件以及整我的情况。整我的人极力要处死我，我心里是有数的。但是因为没有得到陕西省的支持，没有得逞，所以不会对我宣判死刑，更不会在社会上宣布。

¹ 高云鹏2015年9月10日来信。

北大传播我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谣言不知是怎么回事。我看了你们的来信才知道北大在1970年就已经这样传播了，我想这可能就是当时宣传队给汉中的指示吧。”¹

4、十年后，高云鹏回到北京

1980年，高云鹏回到北京，送他回京的有两个人，其中一个人就是高云鹏在知青点时负责和他联系的汉中中级法院的汤同志。回到北京后，开始回学校受到种种阻挠。后来大概到了1982年校党委才做出决定，让高云鹏恢复工作、恢复党籍、恢复工资。但在他办理恢复的过程中，又受到某些人的无理阻挠，不让他回系里工作。当时主管这件事的校领导是张学书，他不愿扩大矛盾，想息事宁人，于是找高云鹏谈话，希望他暂时先不回学校。刚好此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为编辑出版心理学卷，邀请高云鹏到大百科去工作。经校领导同意，高云鹏就被借调到大百科工作了，但人事关系还在北大，工资也在北大领取。

1989年心理学系新的领导班子组成后，要高云鹏回心理学系工作。这时大百科心理学卷也已编成，只待印刷出版了。于是，高云鹏在1989年4月回到心理学系。不久，系里派他到深圳、四川等地去讲课，“六四”以后回到北京。

诬称高云鹏是“8.19炸楼事件决策者”的谎言早已被揭穿，事实证明这完全是迟群之流的陷害。但是，真相并没有完全大白于天下，影响也没有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在不明真相的群众心目中，高云鹏还是汉中“8.19炸楼事件”的主犯。高云鹏蒙冤受屈的事情早已有了正式结论，北大校一级的领导对此都是心知肚明的，但是，在四人帮倒台20多年以后，1998年出版的《北京大学纪事》仍有如下记载：

（1967年）8月19日 高云鹏在汉中653分校参与汉中地区造反派组织的活动，支持抄砸当地公安处，插手武斗。今日发生炸毁（汉中运输公司）大楼的“八一九”事件，造成29人死亡，30余人受伤。

¹ 高云鹏2015年9月10日来信。

如前所述，高云鹏是1967年5月下旬才到达汉中。在此之前负责分校工作的是周培源和戴新民。高云鹏到汉中分校的任务，就是动员学生脱离当地的文革。他的任务完成后，本应很快回到北京，不得已滞留在汉中的直接原因，就是周培源没有回来。《北京大学纪事》的编者在这里采取了一种含混的说法，不知意欲何为？

北大整党时，开除了高云鹏的党籍。高云鹏说过：“我的党籍是在北大整党的时候，大概是1986年吧，被开除的。实际上，我文革以来没参加过组织活动，系里整党时通知我，我没去参加会议。关于开除我的决议是怎么讨论通过的，我也不知道。事后系党委找我谈话，希望我在决定书上签字，我根本不予理睬。一直到很晚的时候了，系党委书记找到我家跟我谈这事。我说，你们通知我几次我都知道，如果我有机会申诉的话，我早就应约去跟你见面了。现在你们把决议都写出来了，就让我签个字有什么意思啊。我不会在这个决议上签字的，因为这个决议是你们强加到我身上的。就这样，我把书记打发走了。”¹

高云鹏在开除党籍后，曾经很感慨地对徐建忠等人说：“说我反党，我为什么要反党？是共产党才让我有机会上了大学！3.29武斗之后，聂元梓让我到44楼把关，这是个别说的，并没有开会研究，校文革也没有通过任何有关的决议。说实话，我从来没把自己当成‘总指挥’，没主持过研究武斗的会议。别人把我看成是总指挥，开除我党籍的时候这也是其中一个罪名，我觉得这些都无所谓，只要把历史事件弄清楚就行了。”

结束语

迟群一伙编造的“判处高云鹏死刑缓期二年”的谎言，骗了我们几十年，我们都以为高云鹏真的是在1970年就被判“死缓”了。迟群们的专制及其余毒，给高云鹏和他的家庭带来了无法估量的伤害。我们这些和他相识的人，谁都不忍心去揭他的伤疤。但直觉告诉我，我应该写一写他的遭遇，我要把真相留给后人，这是历史赋予我的责任。

¹ 高云鹏2015年9月27日来信。

迟群之流虽然没能把高云鹏害死，但却耽误了他近 20 年美好的年华。从 1990 年代起，高云鹏做了心理学自学考试工作，在宣传心理学、普及心理学上都做过贡献，并致力于心理咨询在中国的推广。他现在要做的事情，都是急不可待的。他要给自己的老师写传记、制定自学考试的开考计划、编写教材、讲课等等。他对我们说：“你们对我的情况不清楚，而且听到的和事实又相去甚远。你们希望我能说说有关的情况，我实在抽不出那么多时间去回忆那个时期的事情，因为研究历史和回忆自己的经历是很不相同的两件事情。要投入进去，不仅要时间，更重要的是情感，要全身心的投入。我真怕经受这么剧烈的折腾，特别是我现在花不起这么多时间。”¹我们都非常理解他，尽量不去打扰他的工作和生活。

迟群之流为了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给人罗织罪名，不择手段，诱供逼供，造谣诬陷，无中生有，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无所不用其极。其卑劣程度，令人发指。高云鹏的遭遇，只是他们种种恶行中的一件而已。但他们为什么这样做？最终想达到什么目的？幕后的指使者又是谁？许多问题还没有揭示。笔者年过七旬，已无能力深入探究，希望将来的学者能够做进一步的研究。

2015 年 12 月 3 日（接高云鹏来信后）定稿

附：高云鹏给胡宗式、章铎的信

宗式、章铎：

143 期《记忆》我看了。对章铎文章进行的评论，我觉得有失“客观、公正、公平”的原则，大家应该心平气和理性地来探讨文革的问题，以事实为依据，客观地审视别人的研究，大家的经历不同，视角也不一致，只要是客观事实我们都应该尊重。

文章中提到孙蓬一，我觉得有损于一个人的人格尊严的话不应该讲，老孙已经去世了，说他什么都无法对证，特别是两个人在场没有旁证的事情，说那些有什么意义呢？说起老

¹ 高云鹏 2015 年 9 月 10 日来信。

孙来，他的遭遇实在让人心酸。八十年代初他姐姐把他从青海带出来，住在他外甥家。他外甥来告诉我，我当天就去看望他了，我们俩绕工人体育场边走边聊，晚上又一起去参加了一个聚会。接触中凭着我的知识和经验，我认为他精神出了问题。后来我陪他到安定医院，在正式门诊部确定他是躁狂抑郁症，需要住院治疗。这病不是三天两天造成的，也不是短时间内能治愈的。实际上他在青海时就是这样了，当时把他的表现当作违规的行为，给他关禁闭，折磨他。当初抓他的时候说他态度不好，实际上他的举动都是病态的表现。把他的这些表现当作抗拒，从而从严处理，实在是冤枉啊。老孙从回京之后就一直服着精神类药物，大大地损伤了他的身体，直至后来丢了命。抗日战争的烈属子弟，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战士。1955年才到北大来学习。他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他和绝大多数参加文化革命的人一样，都是出于对社会主义、对毛主席的忠诚。身临文化革命中的人，那时哪有现在这种认识，哪能用现在的是非标准去衡量那时的行为？那时反王关戚就是罪，何况反谢富治、陈伯达、康生、江青、林彪呢。可是，孙蓬一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的作为确实是很难得的。不应该今天说他反王关戚、反谢富治是反革命行为；到王关戚谢富治康生倒了不说他正确也就罢了，再说他保王关戚谢富治康生不是就不实事求是，不是就是明显的派性了吗？如果再去说侮辱他的人格的话，不是就更不应该了吗？

我看到的谈到我的文章有两篇里说我是哲学系党总支副书记，错了。把我和赵正义弄混了。哲学系有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老干部；有当过团市委领导干部、部队师级干部、在野战军前委跟随司令员当秘书的干部，我一个高中毕业考到北大的学生，哪有在哲学系当总支副书记的资历。

关于我是什么时候到44楼的，我确实不记得确切的日期了，但是3.28、3.29武斗我确实没有参与，甚至当时我都不大清楚这两天发生了武斗的事件。所以我很难提供有关这次武斗的情况。孙月才的回忆说的是3月22日开公社总部的会，研究成立武斗指挥部的事。我绝对没有参加，我没有和孙月才一起参加过公社的会议。我到44楼的时候公社已是卢平当社长了。只有见过卢平的印象，根本没有在公社见过孙月才。要查询我到44楼的时间，

还可以问问徐建忠、黄明和商茂虞（徐建忠在宝鸡，黄明在南京，商茂虞在美国芝加哥）。他们和我在同一个办公室，都是同时到44楼的。官香政也能回忆得起来，他一直在公社总部工作，比我早。

关于汉中的问题，提到这事的文章里都是统一在王学珍等人主编的“大事记”里的说法。我在汉中的经历曾经给你们写过信说明过，给我加的罪名，那是迟群之流为了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对我的迫害。我在这里只说一点就能澄清事实。把我送到汉中是当时的宣传队迟群、魏银秋之流主使的，到汉中实际上是先给我按上一个参加汉中武斗的罪名，然后北大宣传队借助这个莫须有罪名的压力，让我来配合他们做假证陷害别人，把北大的是非进一步搞混。陕西省和汉中市早已查清我没有刑事责任，并决定把我交还北大了，但多次联系，北大都以各种借口把事情往后推。1980年陕西省和汉中市派人直接把我送了回来。当时在北京市委接待我们的是北大的陆嘉瑜和高连瑞。他们说汉中只拿封介绍信就把人送来了，他们不便接收，应该写个文书，我们也好向北大做交待。这样，送我的人经过请示，让我在北京家里等候，他们回去办理。过了一个来月，通过法院系统转递给我一份判决书，结论是“宣告无罪”。这样我就正式回到了北京，回到了北京大学。这个判决的结论就不需要我再做多少说明了。如果我像“大事记”里说的那样，楼是我指挥炸的，我能逃得脱法律的制裁吗？有了这个结论不也说明强加在我身上的罪名是迟群之流对我的迫害吗？

还有一种误传，说我在汉中被判了十年徒刑。宣告我无罪的判决已经说明，说我在汉中被判了十年徒刑是不符合实际的。造成这种误传的一个原因是聂元梓在她的自传里说我被判了十年徒刑，她是觉得我冤枉，替我打抱不平说的。其实她也是道听途说，我1980年回到北京并没有见过她，没有和她联系过，她不是从我这里听到的消息。所以我说她也是道听途说，没有根据。我只想澄清事实，而且原来搞错了的也不是写文章的人，他们也不过是引用了别人的说法而已。澄清了事实之后希望不要再误传了。

高云鹏 2015年11月19日

【评论】

王复兴《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回忆录》

序言

马云龙（北京大学中文系 63 [2]班）

在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多年萧条的文坛突然热闹起来。一大批曾经当过红卫兵，后来又上山下乡过的所谓“老三届”中学生们纷纷提笔发声，讲述自己的文革遭遇，控诉那场浩劫中的罪行。这批举着“伤痕文学”之旗登上文坛的“知青作家”，与比他们大了整整一代的“复出右派作家”联手，很快就成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坛上最有影响力的群体。他们所留下的文字，如今成了几乎已被社会淡忘的文革记忆的稀有版本。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在复出的“右派作家”和后来崛起的“知青作家”中间何以会有一个断代？“右派”由于在文革开始前就已经被划为“黑五类”，根本无权参加文革——那时他们唯一的位置是在“斗鬼台”上；“老三届”的中学生们虽然最早戴上红卫兵的袖章，在“八一八”以后不长的日子里风光了一时，但那时他们毕竟年龄太小，始终是在运动的底层和边沿，他们对文革的发言权应该是很有有限的。

文革运动的中心当然始终是在中南海，而与这个中心最接近的是大学，是当时在大学读书的大学生们，这些被称为“老五届”的大学生们在文革中曾经扮演过更重要的角色。文革中的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北京大学，群众与“头号走资派”刘少奇及其夫人的直接冲突发生在清华大学，全国各地的文革运动几乎都是从各个大学的校园开始的，已经成为文革符号的“五大领袖”以及全国各地“造反派”的代表人物也几乎都产生在大学里。可是，从文革结束以来，关于文革的回忆、反思和批判中，偏偏罕有“老五届”的声音，这个当年曾在文革中心舞台上崭露头角的群体，这些最有资格也最有责任追索和揭露历史真相的一代，却成了沉默的一代和失踪的一代。这是怎末回事呢？究其原因，大概有这样几个：

第一是其中不少人——特别是那些对文革介入最深、最了解情况的人，早就失去了话语权。在审判“四人帮”和清查“三种人”的过程中，不少人身陷囹圄，更多的人被打入另册，他们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都被禁声，完全失去了谈论文革的权利。其实不仅是他们，由于文网日严，禁区扩大，在八十年代“彻底否定文革”时曾一度允许的文革研究很快就成为禁区，任何媒体和出版物上有关文革的议论都被严格控制直到彻底消失了。当然，禁令再严，总还有人试图突破，例如，“五大领袖”中聂元梓、蒯大富和王大宾都写了回忆录，但是只能在海外出版，在大陆上很少有人能够读到。而且，最近的事态发展似乎预示着到海外去出版禁书也越来越不安全了。在国内，对出版和言论的管制也在日益加强，在高校课堂上正在厉行的“七不准”中有一条“不准讲党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这条禁令又给文革这段曾被称为“十年浩劫”的历史贴上了一道新的封条。而关于“两个三十年并不互相否定”的新说法则让人们对手上的认识坠入五里雾中。在这一片萧条和混乱中，人们只能感到恐惧和茫然，曾经饱尝过苦头的“老五届”们多数选择了闭嘴。

还有一个原因是，“老五届”中一些已经融入体制的人，早就自动地放弃了对文革的记忆、回顾和反思。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实行“干部四化”的过程中，文革前的最后一批大学生成了选拔干部优先考虑的群体。于是，一大批“老五届”在经过严格的政审（政审的重点是“文革中的表现”）后纷纷走进了官场，到胡锦涛当政的时代，厅局级、省部级乃至中央级的高官几乎被“老五届”包了。如今他们都七十多岁了，都退位了，但仍然鲜见有人出来谈论文革。究其原因，是因为长期在体制内生存，他们的思想已经被“格式化”，记忆也被严格筛选淘汰，甚至连语言也被规范成了标准的“新华体”，指望这些已经彻底失去了记忆和反思能力的人站出来反思和批判文革，无异于缘木求鱼。

除此之外，“老五届”中的大多数，虽然都或多或少、或浅或深地介入过文革，但是，不管是被威武所屈，还是被富贵所淫，或者是被贫贱所移，他们也大都失去了回忆和反思的热情与胆量，其中有些人早被当年和后来的血雨腥风吓破了胆，发誓再也不问政治了，文革成了他们记忆中永远不愿翻开的一页；还有些人，说起文革来，思想和观念还停留在

当年打派仗时的水平，一张口还是我对你错，我是你非，恩恩怨怨那些老话，根本失去了站在历史的高度反思文革的能力；更有甚者，他们把文革与上山下乡中的一些片段记忆涂上玫瑰色，当成血污和废墟中的鲜花，唱起了“青春无悔”的赞歌……每当读到这些文字时，我深深为那些已经沦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的校友感到遗憾。说到底，这些怪象都是当年没有彻底反思和批判文革，反而把文革研究列入禁区所造成的恶果。

当然，最近几年情况似乎有了点变化。一些年过古稀的“老五届”同学中开始有人试图书写文革回忆了。北大校友也有些人写出了回忆文革片段的“碎片”，这些“碎片”无疑都很珍贵，有利于拼图、还原历史原貌。但史料大多有些零碎。去年四月，十几个文革时期的北大校友在北京怀柔雁鸣湖畔聚会，校友王复兴发出一个宏愿：他要在文革开始五十周年到来之前，把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记忆写下来。时间还不到一年，他果然兑现了这个诺言。到底是学历史的，复兴友果然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他的《文革回忆录》提供了较多、较大些的历史“碎片”。

五十年了，当年二十多岁的青年，如今都成了古稀老人，这些记忆如果不抢救下来，就要永远失去了。他干了件有意义的事，他写的是北京大学文革的记忆，这就更宝贵了。

北京大学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从中南海红墙内走向社会的起点。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了文革中的第一张大字报，6月1日毛泽东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这张大字报，从而在全国掀起了那场被称为“十年浩劫”的血腥狂澜。这件事似乎谁都知道，但是没有几个人能把发生在未名湖畔的这场运动的始末弄明白，说清楚。文革结束后，曾有一些北大人控诉了自己以及一些党的干部和教授们在文革中的苦难，例如季羨林、郝斌等，为北大的文革史留下了重要的史料。但是这些文献主要是诉说自己的遭遇和命运，其目的并不是系统地理清北大文革的过程和脉络。王复兴这份回忆录虽然还是个人视角，但视野却涵盖了北大文革的全貌，这是我以前所未见到过的（聂元梓的回忆录是例外，但她的身份特殊）。

而且，北大的文革史还有其它学校和地方不能相比的特殊性。由于从运动一开始毛泽

东就对北大问题表了态，北大又是全国第一个被“夺权”的单位，北大的思想分野和阵线组合并不充分，这与清华大学形成鲜明对照。后来北大分裂成两派，斗得一塌糊涂，甚至兵戎相见，在这所“最高学府”上演了一场披甲戴盔的中世纪式冷兵器热战，但究其实际，两派在下对党委、工作组的否定，上对毛泽东路线的拥护方面并没有多大分歧。可以说双方都是被政治煽动所欺骗，被领袖崇拜的狂热所裹胁，被高层权斗所利用的工具而已。事过将近半个世纪了，如果有人现在还要争论当时谁对谁错，谁是谁非，那就不仅是无聊，而且有点可笑了。唯一有意义的是，应该追索当年这些从全国选拔出来的高智商“精英”们，何以会沦落到那样可悲的境地，其中应记取的教训是什么。

我和王复兴不是一个系的学生，他在历史系，我在中文系，是在那场大混乱中走到一起的。当年我就觉得这个年龄与我相仿的低年级同学喜欢独立思考，敢于逆流而行，并且从不发狂热，走极端。在两派斗争激化的时候，他选择了相对理性而并不激进的中间立场——“新北大公社”中的“鸽派”，谁都知道，在所谓群众运动的高潮期，越是激进的声音得到的掌声越多，而这种中间立场并不讨人喜欢，会遭到来自两个极端的反对，可以说是左右逢敌，里外不是人。由于家庭出身不是红五类，他当时并没有站到运动的第一线。但是，作为运动中理性中间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北大还是曾经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1968年3月下旬，北大两派矛盾激化，大规模武斗开始时，我公开辞去了北大在首都红代会中的代表职务，并退出了红卫兵组织和文革运动，就是受到他和几个好朋友影响的结果。为此我终生感谢他们。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五十周年到来时，王复兴作为北大文革的一个深度介入者和见证人，从自己的记忆中打捞出了一份记录，为还原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份有价值的拼图——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或者你还掌握了一些他所没有看到也没有提到的史实，那你就发出自己的声音吧。每个当年的北大人都有责任为书写一份更加真实完整的北大文革史献出一份自己的拼图。我想王复兴的回忆录最大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此。■

2016年2月18日

【评论】

洗涤我们被污损的灵魂

——读王复兴的《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

扬子浪

五十年前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历史的狂飙，影响深远弥久。文革的发动者利用思想控制和个人崇拜，居然用一些极其破碎，不合逻辑，并且相互矛盾的口号蛊惑并驱使了千万青年学生，为他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妄想而冲锋陷阵。什么“二十世纪的巴黎公社”，“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到“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用起码的语言学和政治学教科书审视都属荒诞不经。和一百五十年前洪秀全歪传基督教，创立“拜上帝教”有得一比。

但只有一句文革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灵魂的大革命”看来没错，而且颇为灵验。为了以后行文简洁，且称它是文革魔咒，或者文革法力。本来人类的政治活动和精神活动虽有联系，但还是各有领域，有所区隔。但文革这场急风骤雨，台上是令人目眩的高速走马灯，台下是一次又一次站队，半夜里敲锣打鼓的大游行，无数次辩论，互贴大字报，抄家和被抄家，进牛棚和管牛棚等等；以各种形式直接进屋入室，进入了每个人最私密的精神空间。特别是以虚妄的梦境，极端的政治待遇反差，空前的高压加上蓄意的放纵，深刻地影响着思想正在成长中的大中学生。

这场风暴的确触及了所有文革亲历者的灵魂并打上了印记，无论正面反面，他们都难逃这个历史劫数，从此或多或少，生活在它的魔咒中。

王复兴是我在北大文革时期认识的历史系校友。我那时是数力系四年级的，他因为在北京游泳队训练了三年，后因伤转回北京四中并考上北大，因此当时是历史系一年级的。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红兵团“横扫千军”战斗队开会时。他当时给我的印象是身体健硕，

气宇轩昂，讲话谦虚沉稳，又不乏主见。是一个思想深刻，兴趣广泛的人。我们，因为观点相同，性格投合，从认识起，在北大文革风风雨雨中，几乎都走在一起。王复兴和我们都曾经全心身地投入文革，因此自然都一辈子难逃它的法力。

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我随北美校友团回京参加庆典。复兴当时在香港经商，也回校参加盛典。他做东请我们北大文革时一些熟悉的朋友吃饭，记得有李文、马云龙、索世晖、黄虹坚、马西沙、孟关霖、徐森、陈双基、张文虎、王冠英、王兰亭、陈振民、黄诗云等人。他当时就数次提到要出回忆录，2015年初，经复兴、任瑚琏和笔者商议，提议我们当年这些好友应该乘还能走动的时候再聚一次。后来由在京的校友徐森、陈双基的组织安排，我们当年四月在北京雁栖湖一个宾馆欢聚了三天。那个时候，我已经把我的文革日记在网上公布，算堆了一座精神坟墓，把文革的魔咒埋葬了一些，因此稍感解脱。但复兴似乎还被那法力所缠绕。我记得他正在到处购买、收集已出版的各式文革回忆录，约谈北大文革时的各种人物，他告诉我他要写一部北大文革的回忆录。我完全理解，北大文革，他比我了解得多，他又是学历史的，自有他史家的责任和坚守。

一年后，我收到了他25万字的《回忆录》。全书涵盖很广，从他不寻常的家史到对北大文革的全景式描绘。读后，感慨良多。而文革魔咒居然在我脑中复活，让我数夜辗转反侧，不能成眠。反复思忖我们青春的灵魂何以能被深深触及，蛊惑，扭曲成这个样子。

在《回忆录》中王复兴继承了中国史家的传统，敢于直面历史，哪怕是不太光彩的往事，都能秉笔直书。他在回忆中记录了文革初期批评反动学术权威高潮期，他作为全班学生的一员在工作组领导下参加了对北大历史系著名的史学家汪籛的登门批判。后来汪先生在文革的全面高压下，服毒自杀。他在回忆中对此有详细叙述，并表示了最诚挚的道歉。希望汪先生在天之灵能听到他真诚的忏悔。他还多次提到因为他的革命意见和鼓励，他的弟弟放弃了北京工厂的工人名额，上山下乡远赴海南岛农场务农。后来在文革中，因制止武斗而不幸被人开枪射杀。这是他终生的巨创和懊悔，在他的回忆中有多次泪崩和泣血的记录。所有这些道歉和忏悔，是修复被文革损伤灵魂的硕果。是强大和自信的表现。

王复兴在他的回忆录中记叙的许许多多北大文革往事，有些我以前并不知道，或者知道也不上心。但有一件事我认为很值得文革史家大书特书。北大校文革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条》公布后建立的全国为数不多的根据“巴黎公社的全面的选举制”选出的文化革命委员会。但毛泽东朝令夕改，《十六条》公布后基本无效，很快就被他掀起的大串联大造反狂潮所冲垮。所以全国没有几个文化革命委员会，北大这个是特例，是“奇葩”。后来北大左派分裂，各派学生各持己见，纷争不休。但各式精英，各路意见领袖，怎么会没有一个想到要用“巴黎公社的全面的选举制”来改选校文革的呢？文化革命的《十六条》就有规定：“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当然，即使有人提出，在那个氛围下也不可能实现。但问题是没有人提出呀。我们居然这么快就忘掉了那个当初用来忽悠我们的理想主义口号了！看来毛泽东的“枪杆子里出政权”，林彪的“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实在深入了我们的骨髓。我们反思北大文革，应该反思我们怎么会这么快就忘掉“巴黎公社的普选原则”的，而选择了无限上纲的文斗和长矛弹弓的武斗。

我们如果还是仅仅停留并局限在保聂反聂，天派地派的是非对错上，我们就可能在三个方面迷失了反思的方向。一是夸大了聂元梓的作用，这点其实是毛泽东的天纵创意。当年他为发动文革，不惜封聂元梓大字报为二十世纪北京公社宣言。我们现在再看看那份大字报，不过是党争的产物。它讲过北京公社的ABC吗？算哪门子宣言呀？二是开脱了毛泽东，北大文革时期的乱局，有哪一点没有和我们这位前图书管理员校友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三是五十年后我们对北大文革难道就真没有什么新视角吗？

复兴的回忆录还提到了哲学系学生吴丽珍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军工宣队进校后写的一张大字报《校文革就是派文革、武斗文革》。我和吴丽珍也熟，她是一位话语不多十分文静的上海女生，原来也是属于支持校文革的“公社”一派。在谢静宜的有关毛泽东的回忆文章中提到过：毛泽东批评北大校文革是“派文革”、“武斗文革”。通过王复兴的回忆

录才知道：吴丽珍批评本派的话语被迟群引用并上报中央，而后又被毛泽东引用来指责聂元梓和北大校文革。但原创出处是吴丽珍的大字报。北大校文革的确没有如毛泽东梦想的那样演化成新生的红色政权，是一个“派文革”、“武斗文革”。但毛泽东自己似乎脱不了干系。八十年代作家谌容在《人到中年》中创造了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的生动文学形象。这个老太太，开口闭口都是马列主义，但是像手电筒一样照人不照己，自觉或下意识地谋的全是个人的私利。我们这位马列主义的登顶者，不也有一样的毛病吗？他那个中央肯定更有资格被称为“派中央”、“武斗中央”。

迟群、谢静宜曾经用这样的调子批评北大的聂元梓和孙蓬一：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对北大文革如此关切，你们都搞不好，辜负了毛主席的期望，罪莫大焉。其实中央关怀是真，北大文革没搞好，更是真。但这里的因果关系，却不是毛泽东那些中南海的大内秘书和警卫说的那样。正确的因果关系应该是：中央如此关怀，毛泽东朝令夕改，北大无论是谁，聂孙也罢，孔杨也罢，都是搞不好的。笔者仅寄望有那么一天，文革档案全面开放，自由的学者写文革史，能以北大文革作典型，作深入的调查和分析，描绘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必然失败的历史轨迹，和它给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留下的深痛巨创。

自文革结束以来，中国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当年毛泽东的《五七指示》逆几百年的历史潮流而动，鼓吹自然经济。现在的中国早已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并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之一。笔者相信，当年北大文革的大多数亲历者，已有了足够的阅历、知识和现代化的世界视野，完全可以超越当年的小是非、小恩怨，直面真实的也许让自己难堪的史实，写出自己的回忆，为将来这部真正的厚重深邃的北大文革史积累资料。

王复兴的《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在这个方向上走出了重要的第一步。希望更多的校友，抓住上苍留给我们不多的时间，拿起笔为北大文革留下回忆和记录。一是借以洗涤我们被污损的灵魂，二是为我们的母校留下经得起后人检验的历史交代。■

2016年4月6日

美国太平洋时间

【述 往】

抢救记忆

——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节选)

王复兴

第二章 1966年：文革爆发

一、考入北大，半工半读，风暴逼近

1965年夏季，我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在学校本部燕园上课仅有一个学期五个月。第一个学期，给我印象最深的授课教师是教世界史的魏杞文，他经常在课余与我们一块打篮球并多次组织我们全班在晚自习时间做学术讨论或介绍世界史的经典名著。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是规定每人写一篇论文：论古罗马斯巴达克奴隶起义的历史意义。考试卷不评分，也无评语。我只在课下听魏老师说，王渊涛同学写的不错。

第二学期一开学，系领导就宣布：历史系开展文科教育革命试点，下乡半工半读，全系搬到北京昌平十三陵山区军都山下的林场北太平庄。只有五年级暂时不下去，留在校本部写毕业论文（五年级下去仅迟了一个多月）。据查，历史系教改、搬家的背景是：1964年11月高教部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毛主席对毛远新痛斥了现行教育制度，“反对注入式教学”，提出“阶级斗争是你们一门主课。”我在上高三、大一时曾二次听传达、学习此“纪要”。1965年12月底，北大副校长崔雄昆在校务会议上传达中央文件，主要精神是大学文科应半工半读、教学改革，并强调彭真同志要求：“各校尽快行动，先试点。”

于是在1966年1月，我们历史系一、二年级全体学生便打点行装，搬到了座落在山坡上的北太平庄林场。当时三、四年级学生都不在学校，在农村搞四清。四年级同学不久也陆续来到北太平庄，只有三年级还留在四清一线没来。到了北太平庄后，我们一年级近60个男生都在一个大礼堂住上下铺（上下床）。冬天全屋生一个大火炉。记得每天天不亮，我就学雷锋，给大铁炉掏炉灰、加煤块。南方同学不懂怎么弄。2月1日，举办了开学典礼。来了几位北京市委和学校领导，有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市委大学工作部部长宋硕、校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副校长兼历史系主任翦伯赞。记得邓拓是即兴讲话，与其他人不同，没念稿，他说“来到你们这里，好像又回到了当年的延安抗大。”还说“我以前在这一带山区打过游击。”“同学们在这里要准备艰苦奋斗。”彭佩云在北太平庄历史系蹲点领导教育革命和史学批判，彭的秘书是哲学系党总支副书记任宁芬，任宁芬同时给我们上政治课，讲授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事后一看，开学典礼那天，文革首批受冲击的对象基本到齐了。莫非他们感觉到什么，都来到北太平庄亮相，争取主动，或是相互通气来了？反正觉得这事挺怪的。但肯定的是，他们的行动表明，他们都在紧跟伟大领袖，够左的了，但他们谁也没闹明白伟大领袖的“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

当时我们班同学都觉得能亲身首批参加教育革命很难得，热情很高。只有个别从农村来的同学如朱祖雄，反而怨言挺多，整天骂骂咧咧，觉得被打回了原形，好不容易进京上了名牌大学，又回了农村。

在北太平庄的教育革命，就是上午上课，下午劳动，晚上政治学习或开展史学批判。教师们谁有授课任务就来北太平庄住一阵，教学任务完了就回了燕园。我们劳动任务主要是修建宿舍、教室。有的年青教师要求革命化，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英语老师郑培蒂就来到北太平庄住，每天下午和我们班同学一块劳动。她的同系男友许世敏在北大西语系英语专业毕业后坚决要求去边疆，去了西藏部队里工作。在晚间的政治学习中，系党总支号召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要自觉地与家庭划清界线，站到无产阶级一边来，做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天晚上，曾召开一个出身不好的学生生活学活用毛著、自觉革命讲用会。在

全系学生大会上，世界史二年级的D同学讲用，他批判自己的家庭，说母亲和一个国民党军官私通，生下自己，自己是私生子。然后批判了母亲和亲生父亲。表示要站到无产阶级一边来。当时系里党的领导，可能是认为只有这样敢于当众揭露个人隐私，思想斗争才够痛苦，自我革命才够格吧。

晚上或下午开展史学革命，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端罢官》。后来批判“让步政策”、“历史主义”，实为批判翦伯赞的史学理论。在一次全系的批判大会上，五年级的杨绍明（杨尚昆之子）做了长篇批判发言。系党总支书记徐华民在台下对我们说，杨绍明写的批判文章很有水平，就像九评似的。杨绍明的发言稿是一篇大文章，是北京市委给北大历史系下达的任务，意图是给批判《海瑞罢官》等做总结，让学术批判到此为止。同时，全系传达、学习了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二月提纲”。（文革爆发后，‘二月提纲’成了彭真对抗文化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到了4、5月，人人感觉到一场大风暴越逼越近了。一天，同班的徐森对我说，解放军报批判反对林彪突出政治的“折衷主义”，这一定有所指。五一劳动节时，彭真从天安门城楼上消失了。班里开会时，我、高发元、张明华同时注意到了此事并有议论。当时报上批判三家村，点名批判了北京市三个市级领导吴晗、邓拓、廖沫沙。很多人在想：彭真可能出事了。在彭佩云召集的学生代表座谈会上，我们班张明华（干部子弟）发言：“彭真反对毛主席，就打倒他！”当时彭罗陆杨被打倒一事尚未在群众中传达。那次座谈会后，彭佩云在党员教师、干部会议上，指示要注意学生张明华的动向。（这是魏杞文老师在文革初透露的。）

二、文革爆发，燕园大乱

6月1日晚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送、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被毛泽东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以及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此后从6月2日开始，北京市每天都有各大专院校、各中学、机关单位上万人来北大看大字报、开座谈会。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周总理指示的“内外有别”很快失效。据统计，仅从6月1日至6日这六天，北大就贴出了近五万份大字报。历史系三年级同学从四清一线返校后，接连贴出几份批判翦伯赞的长篇大字报。那时北大校园内，人群熙熙攘攘，入夜还有许多小商小贩推车叫卖做生意，有卖茶鸡蛋、煮花生、热包子的，等等。按现在说法，有点像大型嘉年华。按列宁的说法“革命是劳动人民的盛大节日。”当时确实是够热闹的。过了几天，同班的张文虎告诉我，听说毛主席6月1日指示康生在中央台、人民日报广播、刊登北大第一张大字报时，有个批示是“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打破。”用语令人震惊。后来得知，毛泽东确有此批示。¹

6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此社论提到北京大学1964年到1965年的社教运动，提到在国际饭店会议上，以彭真为首的原北京市委对北大左派的打击报复。于是关于北大社教和国际饭店会议的情况，便在学生中盛传。

1964年11月以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为首的北大社教工作组进驻北大并动员、支持干部、教师给校党委、陆平提意见。11月29日，工作组把陆平定为“犯了资产阶级方向性错误。”但不久邓小平、彭真都严厉批评了张磐石工作组犯了严重政治错误，保了陆平，撤了张磐石工作组组长职务，换了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为组长，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及北京市大学部部长宋硕为副组长。

北大社教第二阶段于1965年3月29日在国际饭店开始进行，历时近半年，整以哲学系为主的那些给陆平党委提意见的积极分子，要他们做检查并对他们进行批判，甚至批斗。

¹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2003年。毛泽东1966年6月1日批示。

彭真在人大礼堂小礼堂对北大工作队及北大党员干部作报告时讲：“有的人说，不应批判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打击都打击得，为什么批判不得？”¹

我曾向高云鹏（第一张大字报签名人之一）求证当时国际饭店会议的整人情况，高说：“当时改组后的工作队想把哲学系在整风中提意见的积极分子打成反党小集团，然后化整为零，分到农村去四清，然后就不让这些人回北大，留在农村了。”（我心想，这不就是1957年整风反右时的做法吗？）高云鹏还说：“国际饭店会议整人时，他们的会议主持人就是邓拓。到了1966年4、5月报纸上批判‘三家村’，点了邓拓的名。他们那些在国际饭店会议被整的人就想到，平反、翻案的机会来了。5月19日北大传达了《五一六通知》后，胆子就更大了。”

北大第一张大字报有七个签名人，都是哲学系的干部、教师。除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外，有宋一秀、高云鹏、夏剑彘、杨克明、赵正义、李醒尘。7人共同点是在1964年至1965年的北大社教中，都是批评陆平、校党委的积极分子，在社教后期的国际饭店会议中都挨过整。他们在64、65年批评校党委，与1957年整风、鸣放时期的批评者相比，使用的当然不是自由、民主之类的话语，而是与时俱进的反修话语、兴无灭资类的词藻。在国际饭店会议上哲学系的积极分子须人人做检查，并接受批判。但是他们顶得很厉害。文革初，校园里流传着当时国际饭店会议上郭罗基的一句话，“杀了孙蓬一，还有郭罗基。”同学们对他们不肯低头认错，很佩服，觉得他们是硬汉子。

文革后，有一种说法是康生夫人曹轶欧指使聂云梓贴了第一张大字报。此说法不实。当时我身在北大，切身感到第一张大字报的出现是北大内部小气候和外部大气候自然发展的结果。据笔者调查，大字报最初的酝酿者是宋一秀、赵正义、杨克明三人。尔后聂元梓和另外三人陆续加入。赵正义、宋一秀、杨克明分别起草了第一稿、第二稿、第三稿。聂元梓最后在25号上午与大家一起审稿时在结尾加了三句口号。当时中央有个学术批判调查

¹ 《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1月版，105页（第六章第4节）。

组在北大，组长是曹轶欧。聂元梓拿不准贴大字报的后果，在25号之前曾和杨克明一起去找曹轶欧问：“能不能给北大党委陆平贴大字报？”曹回答“能，只要符合中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就行。”¹贴大字报的行动是六人立意在先（李醒尘是在最后一天才知道贴大字报一事），曹轶欧支持在后。大字报内容曹不知道，曹事先没看过底稿。聂的询问其他5个人当时不知（除了杨克明之外。聂在回忆录中说，在大字报贴出之前，曾把询问曹轶欧之事告知六人，应是记忆有误。高云鹏亲自告诉我，他和宋一秀在大字报贴出前肯定不知道此事，没听聂讲过。）此外，贴大字报的决定是7人自己的决定，并不是曹出的主意。但是聂向曹询问时，曹确实表示了支持。大字报贴出后全校轰动。调查组的张恩慈找杨克明要了大字报底稿。张恩慈是前北大哲学系教员，在社教中与聂元梓在同一阵线，社教后调到马列主义学院工作。张恩慈把大字报底稿交给曹轶欧，曹交给康生。

曹轶欧把大字报底稿交给康生之后，事情下一步的发展，按王学珍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所述：5月25日“当天，曹轶欧派张恩慈将聂元梓等七人贴出的大字报底稿取走，送给康生。后康生背着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将这份大字报稿直接送给当时在外地的毛主席。”《纪事》的这一叙述与坊间流行的说法一致，但并不准确。《纪事》主观判断“康生背着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私自向毛主席秘报，似乎是搞阴谋。实际情形是，5月25日大字报贴出后，5月27日大字报被刊登在第13期《文化革命简报》上，《简报》是《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总编室联合编印的。²按常规，此《简报》不会只送毛泽东一位中央领导。《简报》是由报送中央领导的党的文宣机构上报的。康生当时已是中央文革成员，他的行动是在党的政治纪律的规则之内。康生向毛主席反映与《五一六通知》有关的社会动态（聂等人大字报），完全是责内之事、合法行为，谈不上“阴谋”。历史的真正教训是，在五月中央会议上，当毛泽东把个人的意志强加于全党时，竟无一人抵制。毛泽东亲自主持制订的发动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

¹ 《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1月版，133页（第八章第3节）。

²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589页。

知》，获政治局扩大会议顺利通过，文革大动乱由此开始。在此历史的关键时刻，中央竟无一人是“男儿”。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原因不仅在于众多高级干部的软弱、妥协，而且更在于高干们思想深处对君主的愚忠观念，但更重要的原因应在无法对最高领导人的权力进行约束、监督、制衡的体制中探究。

当毛泽东看到由飞机速递，送来的第13期《简报》时，已是6月1日中午。毛泽东阅后即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不是康生打电话给毛泽东）。毛泽东1967年2月3日同卡博·巴卢库谈话时说，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到6月1日中午我才看到，我就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我说要广播。”¹毛泽东看过第13期《文化革命简报》后有个批示，是写在《简报》上。批示是：“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打破，请酌办。”²毛亲自决定支持并向全国公布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于是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大字报并同时刊登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10年文革由此爆发。毛泽东利用“5.25大字报”，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引发了十年民族大灾难。

康生、曹轶欧在第一时间支持了大字报是事实，说他们事先“指使”聂元梓则不符合事实。文革后聂元梓并未因康生被否定而把贴大字报责任推给康生，其他六人无一承认大字报是受曹轶欧、康生“指使”。

2015年4月29日，在一次北大校友聚会上，我当面就文革第一张大字报出世经过，询问了大字报当事人、签名人之一高云鹏。高云鹏虽已高龄，但身体健朗，思路清晰。他说：最初是宋一秀和赵正义给解放军报社写一篇稿，主要讲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政治大革命。赵、宋分别写了第一稿、第二稿之后，高云鹏、杨克明、夏剑豸、聂元梓参加了进来。杨克明提议干脆改成大字报，大家同意。于是杨克明于24日晚起草了第三稿，把稿子改写成大字报形式。25号早6:00高云鹏到杨克明宿舍取了大字报草稿，与宋、赵、夏四人在24

¹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页。

²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589页。

楼一间宿舍一句一句地进行斟酌、审定，后来聂元梓来到参加审定并在稿子最后加了三句口号。大字报定稿后由夏剑豸、高云鹏抄成大字报。然后五人分别签了名，杨克明不在是由高代签。最后高去贴大字报时在楼道里碰见李醒尘，告知了他大字报内容，他表示同意。于是李醒尘也签了名。然后在25号下午2:30左右便把大字报贴到了大饭厅东墙。从高云鹏以上所述，可知从25号这一天最后审稿、抄写和贴出大字报过程可以确定，聂元梓根本没时间去曹轶欧汇报大字报内容，因此曹肯定不知道大字报的内容。故“指使”一说不能成立。

我于2015年4月17日拜访聂元梓，向她求证：第一张大字报是怎样面世的？她再三肯定“是自发的”。5月19日北大党委开会传达了《五一六通知》，聂元梓在5月19日听了“五一六通知”的传达后，觉得北大的问题有希望得到澄清了，在社教中提意见而后在国际饭店会议挨整的人有希望平反了。于是打算给中央写报告。后来与其他五人（赵、宋、杨、高、夏）商议，决定不写报告，改成写大字报。听了“五一六通知”的传达，是聂元梓下决心“造反”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炎黄春秋》于2010年第一期刊载了聂元梓给编辑部的一封信，其中提到“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与康生老婆并无关联。没有曹轶欧或者没有我聂元梓，那六位同志同样会写这样的大字报的，也同样会被毛主席批示广播的。”聂的这个说法符合实际。

以我之见，第一张大字报的产生，与两件事关联最大。一是“国际饭店会议”，反映了社会矛盾的激化。二是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会议所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反映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旨意。没有“国际饭店会议”或者没有“五一六通知”，缺少一样，都不会有北大的第一张“5.25”大字报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出现。这是两个决定性的因素。回顾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出世过程，说明文革的爆发是上层政治斗争与社会矛盾互动的结果，而不是“阴谋论”的产物。

三、向历史的纵深探索：为什么文革首先在北大爆发？

笔者回忆北大文革，常想：为什么文革首先在北大爆发？在基层，直接的背景与动因是北大社教、国际饭店会议。那么北大社教的发生又有着怎样的更深远的历史背景？有必要从北大在社教之前更早的历史进行挖掘和追问，探索北大五十年代以来的矛盾及其发展。

据笔者文革后的深入了解，从陆平 1957 年到北大上任至 1964 年社教，一般党员干部、教师、甚至学生中，普遍存在着对陆平的不满情绪，与陆平的矛盾不断积累、激化。北大群众与陆平之间的官民矛盾不断积累、强化，直至爆炸有个过程。

1957 年反右时，毛泽东对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不满意，认为他反右太手软，便把陆平派到北大代替江担任北大党委书记。到 1957 年 10 月，陆平一上任就搞了个“反右补课”，增划右派 173 人，使北大右派总数达到 699 人，其中学生 589 人。1959 年北大反右倾机会主义，按北大老人们的说法，“陆平逼死了邹鲁风。”邹鲁风时任北大副校长，1959 年负责北大、人大联合调查组，调查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调查组整理的材料真实地反映了大跃进、人民公社中存在的问题。反右倾运动一来，调查组整理的材料被批判是“猖狂攻击人民公社。”陆平把责任全部推给邹鲁风，主持党委会批判邹鲁风，调查组人员也挨了批判。1959 年 10 月 25 日晚，陆平到邹宅与邹长谈，要邹认真认识错误。邹第 2 日（26 日夜）自杀身亡。邹鲁风死后，陆平批邹是“叛徒”，把邹开除了党籍。当年邹鲁风在师生中广受好评，对他的去世，师生们十分惋惜。以上即北大老人们广为流传的“陆平赶走了江隆基，逼死了邹鲁风。”紧接着，陆平打倒了马寅初。1959 年 11 月，陆平在康生指示下，在全校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批判民主人士、老校长马寅初“人口论”的运动。当时许多干部、教师反对批马，陆平答复“非批不可。”结果，马被批下了台，陆平取而代之兼任了校长。

我的北大历史系学长、62 届毕业生王曾喻，在《北大五年》（刊于《北京大学新闻网》）一文中，详述了陆平领导北大期间，57 年反右，59 年反右倾，再后的批马寅初，61、62 年教育改革中本人的经历与感受。他感到：他在北大的五年（57 年至 62 年）是“多灾多

难”的时期，“在校期间正值北大的民主和科学传统被摧残最烈的时期。”并说“我们这个阶段的北大人，谈及陆平，极有恶感。”并感叹陆平终于“难逃文革一劫。”

我看到一份有关北大副校长、物理学家周培源的史料。周培源于1965年7月在一次外事活动中与周恩来总理相处时，总理问他北大社教的情况，周培源说北大社教很复杂，要写个材料交总理。第2日他便交给总理一封信，状告陆平在北大“乱干”，把北大搞的很乱。北大社教后期，万里找周培源谈话，要他改变对陆平看法，周培源不接受。5.25大字报贴出后，周培源在现场看了大字报后回家，对夫人、孩子说：“我向总理告状，告的就是大字报上的三个人。”¹

我们历史系干部吴维能的经历也很有典型意义。他出身小八路，历史系毕业后留校，57年时任系团总支书记、历史系办公室主任。他应属于陆平体制内的培养对象。1959年因家乡有人饿死，父亲告诉他“没饭吃”，他讲了出去，为此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到食堂干活。文革一爆发，吴维能马上造反，翻身成了陆平体制对立面，成为历史系文革主任、校文革成员。1968年工宣队进校后，追查他1959年右倾机会主义问题，他被逼于1968年11月4日在圆明园投湖自尽，终没逃过陆平1959年定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劫难。

文革后，郭罗基给自己定位是中共的“党内反对派”，表示他在北大从57年到59年、到64年社教、到文革爆发，一直是北大中共陆平党的反对派。虽然不同时期反体制的具体内容不断变化，但他反专制的立场一直没变。据美国中文网记者亚衣对郭罗基的采访，郭回顾了他在文革前的北大经历，他说道：他因“右倾”，在“57、58、59年都受过批判”。他在“1957年从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转向共产党的反对派，从此陷入厄运”。“从1962年开始成为一个自觉的反对派”。郭说“1965年，我和北大哲学系一些人被发配到农村，党委书记陆平对我们说：‘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当时已作好思想准备在农村消磨一生了”。“文化大革命一来，改变了命运”。²郭罗基在1957、1959年都因右倾言论受过

¹ 薄亚达：《十年风焰漫燕园》，刊于《华夏文摘》增刊第762期，2010年8月。

² 亚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刊于《北京之春》杂志，1998年9月号。

批判，也做过检讨。从1962起他决心不再向党领导做任何检讨。¹在1965年的“国际饭店会议”上，他和孙蓬一顶得最厉害。从郭罗基由1957年到文革前夕的北大经历，研究北大的内部矛盾，说白了，就是整人和反整人的历史。

陆平领导北大期间，政治运动不断，整了很多人。历史的规律从来就是，有压迫就有反抗。到了64、65年，北大民众对官僚的反抗，只会攻其“右倾”，不会攻其“极左”，否则就会政治不正确，反抗者自身难保。这样曲线反抗，对大多数人来讲是不自觉的。他们在潜意识的推动下，因不满而起来反抗。但也有个别例外，如57年哲学系被划为右派的王雨田、金志广，在文革中便趁机造反，在北大贴出大字报“我不是右派”，要求平反，要求正义，要求人权。

2010年7月在《领导者》第34期，刊载了韩三洲的《“说实话的时间不多了”——90岁的聂元梓想些什么？》一文。聂元梓对采访她的韩三洲讲：“过去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打倒’和‘砸烂’一切固然不对，可对革命的原动力来说，包括文革，不也是因为官僚主义的存在和社会不公的因素而引发的吗？”这是聂元梓作为文革的第一批造反者，在其晚年，回顾了从1957年至1966年文革爆发的北大历史后，所道出的“实话”。

应指出的是，聂元梓等哲学系左派，在文革之初首批造反，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是紧跟毛泽东的旨意，从左倾的立场出发，以左倾的意识形态为武器，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批判修正主义，反陆平党委。从1957年反右到1966年“5.25”大字报，北大的形势是越来越左，直至文革爆发。

四、对文革之初的记忆

1966年6月4日，魏杞文老师来到历史系学生住的体育馆，立刻被全系学生团团围住，魏说：“同学们要敢于革命，善于革命，但首先要敢于革命！”大家掌声雷动。

¹ 亚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刊于《北京之春》杂志，1998年9月号。

6月上旬，班、级、科、系的建制尚未打破。学校的正常建制是到8月中旬，在工作组撤走、大串连开始后逐渐解体的。我们在6月中搬回38楼前，全系活动都在大体育馆内，体育馆内外贴满了大字报。高年级学生中贴出不少揪“修正主义苗子”，批判陆平社会基础（班里团支部书记）的大字报。我感到高年级学生间多年的磨擦、恩怨都爆发了出来，又好像是大火先从下面烧，从下往上烧。大体育馆内充满高年级学生之间乱斗的景象。我当时认为这种乱斗现象不妥，便在班里开会时提出应矛头向上，掌握斗争大方向，批黑帮，学生间不应彼此混战、乱斗。大家同意，我便起草了题为《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的大字报，贴在了体育馆外墙。魏杞文老师看后，认为挺好，加签了他的名字。但大字报反响不大。这时工作组已进校，并没制止这股乱斗风。

五、北大第一个自杀的人：历史系教授汪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常常告诫自己，一定要敢闯敢干，迎接革命风浪的考验，做坚定的革命派，绝不做观潮派，更不能做落后分子。

6月7日前后，在大体育馆和历史系所在地三院，有许多批判汪篻教授的大字报，有的大字报揭发汪篻在1959年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当时还是以班为单位活动。班里开会时，干部子弟张明华说，别的班在批判中国古代史教授汪篻，他是1959年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咱们班在这场斗争中不能落后。班长、团支书都表示赞同，主张我们班要有所行动。有人提议去汪家里批斗，全班同学表态同意，无一反对。于是大约在6月8日，全班去了汪篻家里，汪说有病，躺在床上。大家喊了口号，其中一句口号是“汪篻必须老实交待右倾机会主义的罪行！”喊完口号就离开了，批斗会前后大约十分钟左右。后来听说，不知哪个班的同学在汪篻家门上贴了封条，汪出门不方便就把封条撕了下来（还有一说法是被风刮下来的）。第二天有外班学生看见封条撕破在地上，便指汪“仇视文革，故意捣乱。”并告到历史系工作组。历史系工作组是从海军和中央各部委调来的。6月10日，工作组找到

汪，要汪认错并把封条复原贴回门上。汪照做了。但他内心无法忍受此一屈辱，当晚吞服了大量“敌敌畏”，于1966年6月11日晨气绝身亡。这是文革中北大第一个自杀的案子。

汪篔（三级教授）于文革前，在历史系被称为又红又专的马列主义史学家。半工半读时，我曾听系党总支书记徐华民对我们学生说过，汪教授是马列主义史学专家，系里要让他把学术成果整理出来，保存下来。汪篔教授过我们秦汉史，我最爱听他的课。他讲课不按讲义，而是天马行空，妙趣横生。他对秦始皇的评价很高，与史学专家杨荣国的理论一致，对“焚书坑儒”、“尊法反儒”持肯定观点，认为是巩固了新兴封建阶级的统治。汪认为汉初刘邦也是“尊法反儒”，他在课堂上举例子说，有大儒求见刘邦，刘邦很讨厌他们，于是夺其冠，把他们戴的高帽子摘下来，往里撒尿。汪还做了一个往帽子里撒尿的动作，逗得同学大笑。当时对中国古代的儒法之争还不像六、七年之后批林批孔时那样，被梁效宣扬的全民皆知并把儒法之争的史论推至极端。当年听汪的讲授觉得很新鲜、有深度。文革中看到印发的毛泽东没发表的讲话中有1958年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曾讲：秦始皇“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民主人士们，“你骂我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不知汪篔是否知道毛泽东的这段讲话，但文革一开始，他就被现代秦始皇给坑掉了。汪篔教授去世后，工作组一位从海军来的工作组成员曾到我们班询问去汪篔家里开批斗会的情况，并说，坏人死了就死了，没事。汪被工作组定为“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

很多年后，我才了解到，汪篔是史学大师陈寅恪的弟子。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曾被史学界认为是马列主义新史学的带头人。自1958年郭沫若公开点名批判陈寅恪后，汪作为陈的弟子的地位也一落千丈，并于1959年遭到批判，此后心情郁闷，身体一下垮了下来，体重掉了50多公斤，由大胖子变得干瘦，整个人变了形。这应是他文革之初自杀的远因，事非偶然。最后，工作组命令复原封条的事件，成了最后的导火索。尽管如此，我们全班同学到汪老师家开批斗会，不能说对他的自杀没有任何责任。我非常悔恨当年自己对汪老师的大不敬。这实在是罪过。此事令同学们追悔不已。汪篔老师：太对不起了！学生诚心

诚意道歉！

六、工作组进校，开展反右，矛头向下

1966年6月3日，中央电台广播、人民日报发布：北京新市委决定向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以华北局文教书记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正式进驻北大。实际上工作组从6月1日已经开始陆续进驻北大。工作组成员主要是从海军航空兵部队及中央各机关、各部委调来。随后从6月5日到6月中旬，北京市各大专院校都进驻了工作组。

北大工作组领导运动的特点是：开展反右，矛头向下。所谓反右，矛头向下，主要指向三类人：一类是党政基层部（有点像农村四清整生产队干部）；一类是知识分子（出身不好或有一般历史问题的讲师、教授）；一类是学生（出身不好的“反动”学生）。张承先在6月15日全校动员大会，说“北大是被资产阶级长期垄断、专政的一个反动堡垒”，运动要打击的主要方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¹6月22、23日，工作组召开全校万人大会，批斗陆平、彭佩云。孔繁、张恩慈做了控诉发言。据6月26日工作组秘书组统计，在6月的26天之内，全校各级干部、教师被斗人数已达230人，被戴高帽游街的有107人。²工作组集中看管、居住有问题的“黑帮”，所谓北大的“牛棚”起始于工作组时期。这个时期北大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人，包括历史系三级教授汪篔、西语系副教授英语教研室主任吴兴华。以非正常死亡的时间密度而言，工作组在短短50多天内有4人非正常死亡，平均不到一个月死2人，远远超过后来的校文革和工军宣队。

6月中，历史系学生搬回了38楼宿舍楼，我们班男生住三楼。

6月中旬，我记得以下几件事：

一是历史系在工作组领导下，五年级批判反动学生二吴二达，其中两人姓吴，其一叫吴九龙；另两人姓名最后一个字是“达”，其一叫王明达。另外两人名字忘了。说他们犯

¹ 《北京大学纪事》2008年版，1966年6月15日条目。

² 《北京大学纪事》2008年版，1966年6月26日条目。

了什么罪错不清楚，我们一年级没参加他们年级的活动。八月初工作组撤走后，二吴二达要求平反，但五年级很快就毕业分配走人了，此事不了了之。

二是工作组组织全系师生参加三年级学生胡德平（胡耀邦之子）等三人的讲用会，讲他们如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自愿中途停止学业，下乡务农，与贫下中农相结合。讲用会后，我和张文虎、徐森等同学议论道：胡德平这三个同学能做到这地步，真不简单，表明他们是真正的革命者。很是敬佩。

三是每天看大字报，不时会碰上各省、市领导或国家领导人。一天傍晚，上海市市长曹荻秋来到北大，有人认出他并高喊：欢迎曹荻秋来北大，立马一传十，十传百，人们从四面八方如万马奔腾，一片啪、啪、啪的跑步踏地声，三、四百人跑来，把曹荻秋围了个水泄不通。我在里圈，与曹相距二、三米，看到曹很紧张，他可能没见过这阵势，似乎有点害怕。曹喊了几句口号：同学们好，向北大师生学习，文化大革命万岁，等等之类。然后匆匆在警卫员护卫下乘车离开北大，也没顾上看大字报。

四是工作组刚进历史系时，就让各班选举三人领导小组，我们班选出的是高发元、张明华、我。这次选举没什么条条框框，很民主。俞政后来告诉我，他投了我一票。过了不久，在工作组主持下重新选举，俞政不知内情，照样投了我一票。但开票宣布结果，我只得了三、四票（全班有25人），当然落选，高、张二人仍被选上。为什么重新选举？俞政认为就是为了把王复兴选下来。俞政怀疑工作组在第二次选举前曾向团员、革干、工、农子弟打过招呼，所以行动一致，都不投我的票。而俞政既不是团员也不是工农子弟，所以没人向他打招呼。俞政分析，工作组进系，肯定首先查阅了师生档案，因此才有这类事发生。此事给我造成了无形的压力。我模模糊糊地感到有种威胁，但又抓不住，说不明。

6月18日前，运动基本上风平浪静，仍按各系、科、级、班建制运行，全校活动极少。

七、“6·18”事件

6月18日，北大发生了众多学生脱离工作组的控制，自发地乱揪乱斗各系学术权威、党员干部的事件。我们班没人参与。我到了傍晚才听说白天很多系斗了“黑帮”，给“黑帮”戴了纸糊的高帽，脸上涂了黑墨，押着做“喷气式”批斗。听说历史系也有老师、干部挨斗。我看到38楼高台前贴了大字横标“斗鬼台”。晚饭后，工作组紧急召开了全校广播会议，工作组组长张承先非常严厉地批评了白天发生的乱揪乱斗现象，强调有坏人、反革命钻空子，捣乱、破坏。要求“以后批斗必须经过工作组批准。”后来获知，工作组上报给中央一个“九号简报”，汇报了6.18事件及工作组的处理方式，把“6·18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刘少奇把此简报以中央文件形式批转全国。

6月18日后，各系工作组要求师生认真讨论张承先的报告，每个人要讲述自己在18日那天的表现，讲自己都干了什么。我们班18日无人参加批斗活动，很快过关。有的系搞人人过关，人人自危，并揪出了个别有问题的“反动学生”。全校揪出了40多名“反动学生”，都控制在各系各班批判，没有搞全校性活动。工作组不允许乱斗黑帮，并不是不斗，而是要有领导地斗。据说工作组内部把所有师生排队，分为四类人，分为好的、比较好的、犯有严重错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工作组手里掌握一个“有问题人名单”，组织他们集体劳动。各系被冲击的干部、教授（被群众称为“黑帮”、“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大多被工作组集中监管，集中住在被群众称为“黑帮大院”、“牛棚”里。数学系讲师董怀允因被批斗和被大字报揭批，不甘受辱，于7月28日自杀。（校文革于1966年9月9日成立后，被工作组监管的干部、教授，包括陆平、彭佩云，经中央文革王任重批准，被校文革接手监管。）工作组内控的第四类人（右派）名单中，各级党政干部521人中有119人属于第四类，占22%。¹

7月12日，地球物理系陈必陶贴出大字报《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批评工作组“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尔后，历史系胡德平贴出大字报，批评工作组“不应当做保姆。”校园出现许多支持或反批评陈必陶、胡德平的大字报。我和徐森、张文虎、王渊涛、俞政等

¹ 《北京大学纪事》2008年版1966年7月10日条目。

人在38楼北墙贴出支持胡德平的大字报。

7月18日，工作组再次召开全校广播大会，对6·18事件突然变调，张承先讲话说，“6·18事件是革命事件”，“批斗黑帮的大多数人是好的，只有少数坏分子捣乱”。“工作组对群众的革命热情估计不足，限制、束缚了群众手脚。”表示“欢迎群众给工作组提意见”。等等。

6月18日之后整一个月，在7月18日张承先为什么突然转弯、变调？当时听到传闻说“上面”批评他了，但详情不知。多年后看资料了解到：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而是藏在湖南的“山洞”（韶山滴水洞）里，琢磨打垮刘邓党系统的战略、策略。他当时和北京方面有何联系，尚无信息解密。但陈伯达在京则于7月13日在常委汇报会上对派工作组提出了非议。接着，在7月17日，北京市委李雪峰、吴德批评了张承先，说6·18是万人大革命，只有极少数坏人捣乱。以上是张承先7·18转弯、变调的背景。毛泽东是7月18日返京，23日前听取对工作组不同意见的汇报，并未对工作组表态否定。直到7月24日、25日在中央汇报会上，毛明确表态说工作组把运动搞的“冷冷清清”，“阻碍了运动发展”，应“撤销工作组”。毛泽东一反他最初同意派工作组的决定，把派工作组压制文化革命作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邓的一条粗辫子，错误路线罪状，抓在了手里。

7月19日，聂元梓在哲学系对师生讲话，说“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7月20日开始，校内保、反工作组两派展开大辩论，针锋相对两种意见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满校园。高干子弟李丹林（李雪峰之女）、贺晓明（贺龙之女）、吕宏（吕东之女）、赵惠生（历史系二年级学生、父亲是海军司令部高级将领）等6人，贴出《爱护工作组，保护工作组》的大字报，基调是保护工作组是保护党的领导。大字报贴在大饭厅东墙。他们的大字报给人一种压力，似乎反工作组有可能滑向反党。我虽然与赵惠生是四中校友，私人关系挺不错，但对他们这种跨系的高干子弟联合签名并贴在大饭厅入口处十分醒目的位置，觉得他们有种居高临下指导运动的味道，对此挺反感，而且不同意他们保工作组的态度。于是我们班经我提议，大家讨论，决定起草一份与李丹林等人大字报针锋相对、批

判工作组的大字报。大字报由几人分段执笔，我写了一个小标题下的内容。大字报主题是批判工作组的方向性错误。签名时，罗志刚要求签第一个，我、徐森、张文虎、王渊涛、俞政、杨桂香、钱凤娟、虞赛莲、郑维生、李延龄等人都签了名。没找干部子弟张明华签，因知道她保工作组的立场。大字报抄好后，贴到李丹林等人大字报的下方。当时有许多人围观、议论这两份一上一下、对立的大字报。过了一天，罗志刚有些害怕，对我嘀咕：会不会围攻他？我对徐森、张文虎说，罗志刚是又要出头，又怕枪打出头鸟。当时，对工作组的反与保，会斗出个什么结果，谁心里也没谱。那时我内心深处也曾闪过二吴二达被打成反动学生之事以及 57 年父亲被打成右派之事。告诫自己绝不可在文革中犯错误，成为右派、反动学生。这一阴影不时会不自觉地脑中冒出来，但我不会对任何人讲。而后我又会不断激励自己，应抛开一切顾虑，用毛泽东思想分析一切，认为正确的观点就坚持，就斗争，在斗争中成长。批判工作组的大方向是对的，一定要顶住，经受住考验。

8、中央文革到北大，工作组被撤销

7月22日、23日二天，江青、陈伯达到北大调查，看大字报，开座谈会，接见了聂元梓。这消息马上传遍了燕园，人心躁动。

7月25日，中央文革江青、陈伯达、康生、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戚本禹、穆欣，到北大再次召开座谈会。尔后当晚在五四大操场召开万人大会，辩论工作组问题。江青主持会议，她首先逐一介绍了中央文革每个成员（这是文革时期中央文革第一次在群众中亮相）。然后保与反工作组的两派不同意见的师生轮番上台发言。每种意见表达完后，都有几千个不同意见的群众对所支持的发言鼓掌、欢呼、呐喊：“对！”、“好！”。两派的声浪不相伯仲，气氛热烈。

第二天26日晚，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再次到北大五四操场，继续召开万人辩论大会。李雪峰、吴德、张承先也坐在主席台上。江青主持大会。批评工作组和保工作组的持不同意

见的师生轮流上台发言。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中文系61级学生李扬扬代表31名高干子弟的发言。31名高干弟中包括贺晓明（贺龙女儿）、李丹林（李雪峰女儿）、张少华（毛泽东儿媳，即后来的邵华）、张少林（张少华之妹）、赵惠生（父亲是海军高级将领）、雷渝平（雷英夫女儿）等。李扬扬在发言中强调工作组成绩是主要的，工作组是“延安”，不是“西安”。李扬扬发言的最后，用很长时间一个一个念了31名高干子女的名字。似乎人名比内容重要。但另一派群众根本不买这批高干子弟的账，他们批评工作组压制群众革命热情，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江青发言时，说有人把阶级斗争搞到她家里去了。说她女儿李讷在历史系受人迫害（指文革前历史系下乡四清时总支副书记郝斌老师曾批评过李讷，李讷是历史系65届毕业生。江青讲话后郝斌受到迫害，直到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后曾任北大党委副书记。）江青还说北大中文系的张少华是个骗子（学生、江青儿媳），她母亲张文秋很坏。（江青点名骂张少华，应与她是31名保工作组的高干子弟有关。事关毛泽东撤工作组的重大决策，因此江青在大会上表示与张少华划清界限，表示张少华保工作组不能代表毛家。不能把江的发言简单地理解为江青仅仅是在唠叨家庭矛盾。）康生讲话中说到，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是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还说6月1日他向毛主席汇报了北大聂元梓等七同志大字报，主席指示中央台全文广播、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从而使聂元梓等七同志获得了解放，他也获得了解放。陈伯达讲话中说到，6.18是革命事件，赞成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北大工作组。江青最后再次讲话，建议北大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自己起来闹革命，要聂元梓负责筹建。

7月28日，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委会成立。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大专院校及中学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会上宣布了中央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刘少奇讲话，提到他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7月30日至8月3日，北大召开三次全校批判大会，批判工作组。

8月4日，江青、陈伯达、康生再次到北大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江青首先讲话，代表毛主席向北大革命师生致敬。康生讲话中，对北大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会表示祝贺，

正式宣布撤销北大工作组。康生说，毛主席讲“聂元梓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宣言书。”会后同学们纷纷议论，认为毛主席把北大文革的爆发比做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伟大创举，是推翻旧的国家机器，创立、选举革命人民的新政权的创举。这是开创了国际共运的新道路。这是伟大领袖号召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用直接民主方式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同学们为能亲身参加这一伟大革命而感到生逢其时，太难得，太荣幸了。这是那时本人及周围同学们的思想认识和心态。多年后得知，康生传达的关于毛泽东赞誉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是“北京公社宣言”，是毛泽东在同一天（8月4日）早一些时间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的，毛说：“北大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¹毛的话，康生当天晚上就拿到北大群众大会上讲了。

随后在9月初，校系两级文化革命委员会通过民主选举，纷纷成立。北大文革主任是聂元梓。校文革成员由各系选举推出，有：邓朴方、王茂湘、吴维能（笔者所在的历史系）、孔繁、杨克明、姜同光、徐运朴、候汉青等人。孔繁、杨克明任副主任。我们历史系的文革委员会主任是吴维能，副主任是魏杞文老师和三年级学生胡德平（胡耀邦之子）。历史系选举时，三年级学生推荐胡德平时说，胡德平“根红苗正”，“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有敢闯敢干的革命精神”。我们班全体投票选举了魏杞文、胡德平。

据1966年9月13日《新北大》校刊记载，1966年9月9日全校进行投票选举校文革委员会，全校有选举权的人是13,836人，因外出串联等原因，实际参加投票的是9,609人。（投票人占有选举权人数的69.4%）“选举结果：42位当选为校文革委员会委员。校文革成立后，发了‘向毛主席致敬电’，称北大‘第一次实行了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选举制’。”这个“第一次”应是北大百年史上空前绝后的唯一一次。但这种一人一票的直接选举方式并没在全市、全国推开。“文化革命委员会”这种权力机构的形式，在北京，在全国，成了罕见现象。究其原因，毛泽东、中央文革根本无意推广这种全民投票的选举方式。北大师生也不懂这种选举的意义，因此后来的“井”、“红”以及再后来的“井冈山

¹ 陈东林、林蒲主编《共和国史记》第3卷上第116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兵团”，要推翻校文革，无人提出重新投票选举或全校来全民公决，支持校文革的一派也无人用当初“校文革”是全民投票选举出来的合法性，来批评要“砸烂校文革”的反对派。孔繁、杨克明、徐运朴、候汉青后来退出校文革，也没想着需要征求选民意见。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实行的“大民主”，是个临时措施，是权力斗争的手段，与现代“宪政民主”完全无关。不过在1966年9月，在北京大学，确实曾发生过这么一次：一人一票、全民直接选举权力机构的实践。

九、对文革初期“五十天”的反思与认识

文革后，国内官方宣传刘少奇、邓小平在文革初起阶段以工作组领导运动是一条务实的马列主义路线。有的文章认为是一条抵制毛泽东文化革命的正确路线。近年海内外有许多人认为，那“五十”天，是刘、邓以57年反右经验为基础，展开的一场新时期的大规模反右斗争。刘少奇、邓小平既是文革的受害者，同时又是对人民的迫害者。我赞同后一种观点。

据美国研究文革史的华人专家宋永毅研究和披露：文革之初刘少奇执政时曾针对工作组的工作，下达指示“准备再打几十万右派”，准备再重复一次57年反右的“战绩”，极其冷酷无情。刘少奇于1966年6月13日，刚派下去工作组不久，在批转中央下发的文件《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报告〉》及《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时指示，“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不要急于反击。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领导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¹这和中共57年“引蛇出洞”，然后残酷斗争的方略一样。刘少奇在批示上述中南局的文件中还指示：“在大学中，也要把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揪出来，但应放到运动后期进行，打击面应当小一些，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²

¹ 宋永毅：《刘少奇对文化大革命的独特贡献》，刊于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第238页。

² 阎长贵：《搞历史首先要史实搞清楚》，刊于《华夏文摘》增刊，第855期，2012年7月10日。

按当时有 100 多万大学生计，百分之一是一万多人。但实际上仅在北京 24 所高等院校，工作组在“反干扰”、“抓游鱼”的斗争中，已把 10211 个学生打成“右派”，2591 个教师打成反革命（根据文革时期首都三司红卫兵小报统计）。仅仅在北京的 24 所高校，且在运动初期，工作组已超额完成了 1% 定额指标。刘少奇指示中学高三年级也可以揪出少量右派。高三学生才是十八岁左右的孩子啊，也要抓右派。按刘少奇的指示，如果反右扩展到全国，到了运动后期，在大中学校进行反右的惨烈程度，肯定会大大超过 1957 年。但出人意料的是，运动的走向，在毛泽东的掌控之下，完全与 1957 年的反右斗争，背道而驰。

清华的蒯大富 6 月 21 日贴出反工作组的小字报。王光美指蒯“要夺权”，薄一波指示“要反击”。工作组组织师生在校园游行，高呼“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全校展开了“反蒯”斗争，各系整了不少学生。我们班徐森和清华汲鹏是北京 13 中同班校友，我们去清华看汲鹏，听他说工作组整了很多人，各系都抓了一些反工作组的反动学生，他和蒯大富一样，被打成反党分子、反动学生。王光美的清华工作组比北大工作组整人厉害得多。北大揪出 40 多个“反动学生”，清华揪出了 800 多个“反动学生”。因此清华在后来批资反路线时反弹的力度比北大就大得多。8 月初周恩来到清华为蒯大富平了反。平反后的蒯派后来组成清华井冈山造反团，矛头自然地直接指向了王光美、刘少奇。毛刘之争在清华表现的更明显。毛泽东一反 1957 年之道而行之，利用了反迫害、要自由的群众，冲击刘邓控制的党务系统，以夺回他自己所说的已“大权旁落”之大权。毛泽东曾把自己的斗争谋略总结为：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他对这一权术的运用，在文革中屡见不鲜，十分纯熟。清华运动的翻转，使人们清晰地看到了中央的斗争与底层社会的矛盾斗争之间，相互交织与互动。

1957 年反右后，人们普遍不敢给党的领导提意见，谁给基层领导提了尖锐意见谁就是反党、右派。这成为绝大多数党团干部的定式思维，成为文革初期保皇大军形成的思想根源。但在 1966 年 8 月事情发生了变化，8 月《红旗》11 期刊文，透露《人民日报》6 月 2

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时，毛泽东加了一条注：“对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而后《人民日报》也发文宣传毛泽东的这一指示，这对当时我和我的同学好友们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造反有理”的根据。“对错误的领导应坚决抵制”这一党中央的新的提法，对1966年8月以后造反派抛弃57年反右思维，形成造反大潮，影响巨大。

十、一次全班会议

8月上旬，工作组撤走后不久，以班为单位进行活动的建制维持了一个很短时间。有一天开班会，地点在38楼下北侧院子里，全班同学围了一圈，席地而坐。开会时，班长高发元（贫下中农出身）突然说，“大家不知道，王复兴是从美国回来的，他父亲是右派。王复兴要在运动中好好改造思想。”我一下“懵”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会后心情很坏，很苦闷。心想，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可为什么我怎么努力都不行呢？难道父亲有问题，我就不能革命吗？我七岁从美国回来，就有特务嫌疑吗？他这是“左派幼稚病”、“关门主义”，是错误的。我还是要努力，积极参加文化革命。俞政后来对我分析此事，对我讲，高发元之所以知道我的家庭情况，应是工作组在校时向他透露的。工作组进驻北大期间，查档案是他们必不可少的工作，这是共产党管治人民的基本作业。工作组在校时班里第二次选举的黑箱作业就是这么回事。当时高发元尚未摆脱工作组影响。后来在1970年2月毕业前的一次班会上，高发元向我道歉，说他那次发言不对。毕业后，他又曾写信给我，再次向我道歉。我一直认为高发元是个很正直的人，当时他那样说也不能全怪他。当时毛泽东支持的中学第一批红卫兵（人们称其为“老兵”或“主义兵”），已在全市各处张贴、宣扬血统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部分学生中影响很大，形成一股思潮。当时由许多高干子弟所鼓动，以“阶级分析”、“阶级路线”为名，行“人分等级”、“贵贱有别”之实。

8月中旬，北大几个系出现了首批大学红卫兵。历史系一、二年级以赵惠生、徐博东、张明华等几个高子弟为骨干，吸收一批工农子弟，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我们班大部分人没份参加。历史系“主义兵”成立后，在五四操场举行过批斗陆平大会，去过团中央造反贴大字报。

.....

十一、恐怖的“红八月”

.....

8月一天晚上，我正准备睡觉，有人大声敲门，我开门一看是妹妹王丹娜，她骑自行车跑了几十里地来找我，神色紧张。我赶紧拉着她到楼道口，问她：出什么事了？她说家里附近邻居有的地富，被红卫兵打死了。她怕红卫兵来抄家，母亲脾气急，如果跟人家顶嘴、吵架，那非挨打不可，弄不好会被打死。问我怎么办？我也没什么办法，只能告诉她，回家嘱咐妈妈千万不能和红卫兵吵架。妹妹回家后，把家里的老相片全烧了，把老唱片砸碎了。（几十年后父亲向我抱怨，写信给我说，文革时自家的红卫兵在家里造反，把老照片都放火烧了，真可惜。我回信告诉父亲，妹妹那时没资格当红卫兵，她不是造反，而是恐惧，是为着自我保护，而干了烧相片的傻事。）后来真有一队红卫兵来到我家，幸亏姐姐王瑞拿出祖父是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的证明，才免于抄家。来我家是哪个学校的红卫兵？家里根本不清楚。我回家问他们，一问三不知。

八月底的一天，清华好友、自控系三年级的于宁（四中校友、北京游泳队队友）来北大找我，他说“现在是红色恐怖”，说前二天有许多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及其他中学的红卫兵来清华撕大字报（被撕的主要是揭批王光美、刘少奇的大字报），他们高喊并张贴大标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还殴打了“黑帮分子”（一部分清华的党政干部和教师）。据说这些中学红卫兵得到当时清华文革筹委会头头贺鹏飞（贺龙之子）、刘涛（刘少奇之女）的支持。工作组撤走后，蒯派和

筹委会斗的挺厉害。

大约是在8月底，我去于宁家。他家在北京市内北海后门东边、什刹海对面的米粮库胡同。我正赶上他们家刚被抄家，看到了他们家刚被抄后的惨景。满屋碎纸、一片狼藉。于宁母亲一脸无奈地对我说，“家被抄过了，四旧扫掉了，没包袱了，也就轻松了。文化革命嘛。”于宁告诉我，这事赖他在邮电学院的妹妹，她跟邮电学院的红卫兵闹的挺僵，结果人家来抄了他们家。他们家的房主是于宁祖父，他祖父是原张学良东北军的一个军长，父亲是知识分子。

8月工作组从北大撤走后，批斗“黑帮”的烈火骤然烧旺，北大历史系的三院贴满了批判翦伯赞的大字报，也有揭发、批判系党总支及某些干部、教师的大字报。三院门口有个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后来同学间传说，李讷（毛泽东女儿、历史系65届毕业生）到北大调查后回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了此对联，毛说应改一个字，“浅”字改为“深”字，下联改成了“池深王八多”。李讷再到北大调查时，把这个最高指示告知了历史系老师和聂元梓。这一字之改，对北大文革的影响非同小可，造成了对各系干部、老教授们的猛烈冲击，历史系尤甚。当时北大掀起了抄家风。在劳改的“牛棚”里，有许多党员干部、教师被打成“黑帮”，白天在校园下地、拔草，脖子上挂个“XXX黑帮”的牌子，晚上集中到“牛棚”睡觉。那时每天从全市和外省市来北大参观、取经的群众达几万人，高峰时每日达七、八万人。有些人围观“黑帮”劳改时，喊口号、辱骂、甚至推打。这些对全市、全国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那时在中国的最高学府、中华文化的象牙之塔，完全没有法制可言，暴民政治波及全国。那时有一篇毛著影响极大，即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北大有人将其全文抄写成大字报贴在留学生宿舍楼对面的大字报苇席栏上。毛赞赏的“痞子文化”风行一时。我当时对这种不人道、不文明的事，很看不惯。心想，中央怎么还不下文，制止这些不符合政策的事呢？这些想法，只会想，不敢说。能做的只是不沾手，不参加。

.....

8月时，历史系有二十几个干部、教师被关入“牛棚”劳改。到9月时，历史系文革委员会在昌平北太平庄（原历史系半工半读地址）设了劳改营，把关在燕园的23名历史系干部、教师移到此处。当时我们历史系一年级同学全不知道此事，近年才知在66年9月27日，向达、杨人鞭、邓广铭、邵循正、商鸿逵、周一良、宿白、阎文儒、吴代封、郝斌、田余庆、徐华民等23人被送至此处劳动改造。一个月后开始分批返校，最后一批5人迟至67年3月返校。北太平庄的“劳改营”既清静又安全。当时还有两名患神经衰弱病的学生也一同到此处休养。按郝斌回忆，比起在燕园牛棚时的挂牌劳改，被人围观、辱骂，在北太平庄倒是清静了许多，少了许多侮辱。他说“像北大校园那样整天的追逐、围斗，就幸免了。”近年看资料才知道，当年在北太平庄监管他们的是历史系二年级学生高海林。近年郝斌（文革前历史系党总支副书记、文革后曾任北大副校长）曾著文向在某大学任教的高海林隔空喊话，要高海林忏悔、道歉。周一良（历史系教授、文革后期“梁效”成员、文革之后曾任历史系主任）则著文表示“大家都信过神”，其意对高海林之事，应把这一页翻过去了。

十二、8月经历的几件大事

8月1日至8日，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北大学生得知，聂元梓、杨克明作为革命师生特邀代表列席了会议。在会议后发表的公告中，我注意到林彪排名上升至第二位，陶铸排名上升至第四位，刘少奇排名下降。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全国百万红卫兵。8月上旬全国学生开始大串联后，北大学生宿舍、体育馆挤满了外地学生。8.18一大早，我们在校未出去串联的学生被组成临时纠察队，带领外地学生坐上大卡车奔赴天安门广场。我们学生纠察队与北京卫戍区战士一起负责维持序，我当时被安排在天安门西侧金水桥前的纠察线。大会开始后，当毛泽东走到天安门城楼西侧向下招手时，我和几万人一起狂呼“毛主席万岁！”那是毛泽东第

一次在文革中穿上军装。我心想，主席穿了军装，这是表示要带领红卫兵进行新的长征，打个大的政治战役吧？另外，我注意到林彪站在毛主席一旁，周恩来站在另一旁，刘少奇站的位置离主席远了。对此我感到反常，但没敢多想。

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检阅全国百万红卫兵。没有去外地串联的我，又一次作为北大学生临时纠察队队员，到天安门广场与北京卫戍区战士一起维持秩序。这次天安门广场对人群的布局，与8.18明显不同。环绕广场一圈，由人墙组成了一条10米左右宽的车道，沿长安街向西，南拐经人大会堂，东拐经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北拐经历史博物馆，西拐经天安门回午门。我所在的警戒线位置，在西观礼台下靠南30米左右。我们被通知，毛主席将乘敞篷车检阅红卫兵。下午四点左右，一行几辆敞篷车由天安门午门缓缓开出。当几辆敞篷车开到我正前方时，对面另一侧人墙（二层人，一层学生纠察队、一层战士）突然被巨浪般的人潮冲破，毛泽东的座驾被团团围住，动弹不得。我当时离他的座驾约10米左右。我清晰地看到毛泽东坐中间，左是林彪，右是贺龙（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尚未被打倒。）我心想：毛主席这是抓着枪杆子搞文革呀！毛泽东座驾的后排站着两名军人，第一排除司机外还有一男一女两名军人。当时毛、林、贺脸色严肃，极不高兴。五、六分钟后，从午门方向冲过来一字长蛇阵的近百名带着领章、帽徽的军人，他们个个身体健壮，臂力极大，每人用双臂向两侧拨开人群，大约仅用了20分钟左右时间，挤到检阅车旁。（眼见为实：这一支应对突发事件的队伍，既不是孔丹在口述回忆中所说的年稚的中学红卫兵“西纠”，也不是一司头头所说的大学红卫兵“一司临时纠察队”，而是类似特种兵的正规军人。）然后我看到，车队被士兵们推着，缓缓向午门撤走，周恩来爬上了毛泽东所在检阅车的车头，弯腰站在车头向前俯身，双脚穿着一双锃亮的硬底黑皮鞋，后面有一战士双手搂着总理的腰以防滑倒。我心中暗叫，小心！周指挥人群向两侧后退，并不时招呼人群“小心压脚！”一串检阅车缓缓撤回午门里。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毛泽东等一行人出现在城门楼上，大会开始，时已近傍晚。这一幕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心想，周恩来真是：鞠躬尽瘁，忠心护驾。他对领袖无限忠心，但同时心中也总想着民众（怕滚动的车轮压到人群）。我

时常想，这应是周恩来的特点，他有着忠君与忠于人民的两重性。记得周恩来在文革中与所有人一样，胸前也佩戴毛泽东像章，但他所戴的像章较特别，是横的长方形，上有“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并有个毛泽东的小头像。

从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泽东八次在天安门广场检阅全国红卫兵，被检阅的红卫兵总数达到1200万。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正话反说，对党的高级干部们讲，他干了三件事闯了大祸，一件是支持了聂元梓大字报，一件是支持了红卫兵，一件是支持了大串联。毛泽东以此三件事，动员起民众中蕴藏的巨大力量，人们在想：他要干什么？

8月下旬，我在38楼北侧苇蓆大字报栏，看到有人抄写的毛泽东在八届11中全会上于8月5日发表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心想，这个“62年的右倾，64年的形左实右”是谁呀？在五十多天里镇压群众，“何其毒也”的“司令部”是指谁呢？难道是刘少奇？难道他另外有个与毛对抗的“司令部”？过了一、二天，哲学系、历史系有人在38楼下，贴出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历史系有张大字报是批判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的形左实右路线，批判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我正看着，有个历史系高年级同学走到我面前对我说，他参加过四清，传达、贯彻过王光美的“桃园经验”，“那是打击一大片”，凡是生产队的干部都要烧一烧，整一整。“不管树上有没有枣，有枣没枣打三杆。”有同学记得，北大在8月最先贴出刘少奇大字报的是法律系的。

十三、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反思

反思毛泽东发动的文革，须回答两个问题：一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二是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发动文革？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这要追溯到1953年3月5日，这一天斯大林去世。国际共运与社会主义阵营失去了领袖、导师。一直怀着成为千古一帝梦想的毛泽东要填补这一空

白，要与苏共争夺国际共运、社会主义阵营、世界革命的领导权。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仍是一穷二白，不具备实力当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儿。为了从经济领域赶超苏联，毛泽东于1958年发动了“大跃进”。结果失败，遭到了三年大饥荒，饿死了三千六百多万人。¹在这一大背景下，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奋起纠错，与毛泽东发生了路线分歧。刘少奇把三年困难归结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则坚持“大跃进”、“三面红旗”是“九个指头”正确，错误仅是“一个指头”，路线正确。但在严酷的形势面前，党心倒向了刘少奇，众多干部在检讨“大跃进”中的错误时，对弄虚作假、比赛吹牛等荒唐事进行嘲笑，有意无意地对毛冷嘲热讽。这使毛泽东深受刺激。毛认为“大权旁落”，他咽不下这口气，萌生了除掉刘少奇并同时整治干部队伍离心倾向的想法。正如毛泽东在1967年2月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巴卢库谈话时所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²江青说得更直白，她于1967年4月12日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时憋了一口气。³——毛在文革中终于扬眉吐气，一吐胸中块垒，打倒了政敌刘少奇。七千人大会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起点。

七千人大会结束七个多月后，毛泽东开始反击，于1962年9月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对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尔后，开展了全民学九评苏共中央的文件；开展了四清运动；开展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革命大批判（包括：文学、艺术、电影、戏剧、历史、哲学、教育等）。直至1966年5月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打倒了彭、罗、陆、杨，并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订的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由此开始了中华民族的十年浩劫。

通过回顾毛泽东准备并发动文革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为着夺回他“大权旁落”之大权，为着坚持他“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五七指示”、“限

¹ 杨继绳：《墓碑》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9年1月六版下篇，第904页。

²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281页。

³ 同上。

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空想社会主义治国理念，为着掩盖他造成三千六百万人饿死的三年大饥荒之罪错，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就是他的动机。

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发动文革？他之所以能发动文革，因具备了上、下两个层面的条件。

上层的条件是，党和国家的权力高度集中在毛泽东一个人身上。早在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便曾通过一个《决定》，赋予书记处主席毛泽东拥有“最后决定权”。虽然此“决定”在一年二个月后随着新的书记处成立而无形中取消，但在党内高层造成了深远影响。中共没有监督、制衡、约束最高领导人的规则。从十七年到文革，全党大力造神，把毛泽东推上了无比神圣的宝座，形成全民宗教式的个人崇拜。记得我曾于1965年初在西单长安大戏院观赏了大型歌舞剧《东方红》，该剧总导演是周恩来。演出的艺术水准很高，主题是歌颂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这个歌舞剧影响很大。我看完演出后，心情十分激动，对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由衷地崇拜。当时在全国形成了毛泽东的指示就是“最高指示”，就是圣旨，就是法律，任何人不得违抗，全党、全国都必须执行这样一种机制，谁反对毛主席的指示，谁就是反革命。当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纲领《五一六通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顺利通过时，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全党竟无一人是男儿。文革由此开始。其教训是：除了高级干部的软弱、妥协之外，还有他们对君主的封建愚忠观念起了重大作用。更重要的是，党没有监督、制衡、约束最高领导人的机制。谁也管不了毛泽东，他可以以为所欲为。

当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被毛泽东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大字报”时，他们的斗争方向与胆量就是来自于《五一六通知》。他们响应党中央《五一六通知》的号召，紧跟毛泽东，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把火。

毛泽东能够发动文革的下层条件是：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中国社会已积累了厚重的官民矛盾。从1949年许多地方的土改扩大化到肃反扩大化，从1957年的反右到反右倾机会主义，从1959至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到城乡社教运动，官民矛盾不断积累、激化，最后爆发。

回看十七年，各级政府没有监督机制，就难免滋生官僚主义、一言堂、脱离群众、搞特权、贪污腐败等现象。司法不独立，以人治代替法制，社会如何达到公平、公正？舆论一律，无新闻自由，人民无法监督各级官员。没有人权观念，公检法滥权，人民的生命、财产、尊严得不到保障。总之，由于没有宪政民主，官民矛盾无以化解，反而越积越多。最后，人民的不满情绪被毛泽东所利用，发动了一场自下而上的炮轰各级党政领导的造反运动。亿万人民在文革中掀起了令全世界目瞪口呆的滔天巨浪，这并非毛泽东一个人的能量使然。毛泽东充分利用了官民矛盾，利用群众的力量教训与自己离心离德的干部队伍，并打倒了政敌国家主席刘少奇。而后再重建、恢复他的党国体制。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贴出了在文革之初被毛泽东称赞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这与北大的社会矛盾有着深层的关联，特别是与1964年至1965年的社教运动及国际饭店会议的整人运动直接有关。■

【述 往】

南下串联与贵州文革¹

张 甦

前 言

当年，卷入文化大革命洪流中的一代青年，无论是打先锋的学生，还是充当主力军的工人、农民，乃至扞卫国家安全的军人，如今已入老年了。而现今三四十岁的中年人，提起“文革”已不知它为何物，更不用说少年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艰难地走向繁荣昌盛，走向科学与民主的历史长卷中，十年文化大

¹ 此文摘自张甦著《激荡岁月》（第二部）一书。

革命对于伟大的中华民族来说，都是教训惨痛因而刻骨铭心的一章。因此，实事求是、全面而完整地还原十年“文革”的本来面目，给后人留下宝贵的历史遗产，实在是当年亲历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正基于此，便有了下面的文字。

第一章 南下串联

一、几封老信引起的回忆

2011年4月初，贵州省体校高级语文教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当年贵阳师范学校六五级女生谢慧金，将她保留的，在“文革”期间我写给她的大部分书信（时间刚好跨越一年：1967年2月2日至1968年2月2日）复印了给我；还有我发表在贵州工学院《春雷战报》上的长篇文章《贵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刘修的门徒戚修》抄件。看着这些历经半个世纪的书信、文章，不胜唏嘘。现在看来，这些文字是何等幼稚！但也不乏理想与信仰。就说它的思想，又是何等浅薄！但也不乏真诚。它是啥样，就是啥样！任由后人评说吧。这些文字也勾起了我沉睡的记忆。我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情景。

二、南下贵阳“煽风点火”

给谢慧金的第一封信摘录（1967年2月2日于北大）

.....

去年六月初返校，参加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后来展开了反工作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那时，我和本班少数同志一直坚持真理，勇敢战斗，受到了少见的围攻，压力是相当大的。我们深深懂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什么。因为，是代表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江青、伯达、康生同志挽救了北大，也解放了我们！

八月初，工作组赶走了，我开始心忧贵州情况！那时贵州的同学没来过一封信（因为

白色恐怖)。我怀疑。后来串连了北大的贵州同学，共同凑了凑，发现贵州问题很大。于是我们便决定“打回老家”！8月21日开始向学校申请，一连三天，由于王任重的阴谋，学校不放。8月24日晚，我便只身“逃跑”了（其他贵州同学受阻）。在火车上我拉了北大生物系四个同志，组成了北大第一批赴黔的队伍。又和其它院校同志在火车上成立了“北京南下串连二队”（我们是第二批抵黔的，共16人；第一批共12人），开赴贵阳。

8月28日到贵阳后，我们反掉了“神秘化”，主张轰轰烈烈大干，走群众路线，大搞煽风点火！同时调查研究，摸到了初步的、但又是实质的情况。于是我们就向省市委轰了第一炮：贴出了“六问贵州省委”的大字报！女中的闯将把这张大字报搬上了街！在其他陆续抵黔同志的努力下，大火起来了！贵阳市的运动走向了爆炸局面。

我的活动，引起了省市委的恐慌！因为我们那犀利的笔，决不会放过那帮害人虫！9月5日晚，经过他们的精心策划，终于抓住了我。于是戴高帽子、游街、站高板凳、低头、殴打，足足折磨了二十多小时。在中华中路的“斗争会”上，我高喊：“贵州省委、贵阳市委反革命的日子混不长了！”“毛泽东思想的阳光必将普照贵州高原！”

9月8日，我们的大字报“贵州省委、贵阳市委反革命的日子混不长了”贴到了大十字！使省市委的老爷们恐慌万状！

9月11日，我参加了“赴京代表团”，北上北京，向中央汇报。9月24日返回贵阳！此间，他们搞了大量的传单、大字报、大标语围攻我，造谣、诬蔑、盯梢，无所不用其极！

……现在，需要对上述书信内容作补充和说明的，有下述几点。

三、关于所谓“王任重的阴谋”

1966年7月底到8月初这一段时间，工作组撤销之后，北大临时校文革领导小组成立了，学校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各色各样的人如潮水般涌进来：他们有走来的，有开车来的；

有大学生、中学生，还有小学生；有干部、知识分子，也有工人；有北京城区的，也有郊区的，还有从天津、南京，甚至上海赶来的。人们争先恐后看着大字报，或拉着北大学生询问北大运动，甚至还把我们请出去作报告。我班就接待过任弼时同志的孙子；我和本班同学曾被接到通县卫校作过报告，下午大汽车拉过去，第二天黎明才送回来。……革命大串联的洪流汹涌澎湃，已无法阻挡！北大学生纷纷要求“打向全国去”，当时王任重同志担任中央文革副组长，主持北大运动的校文革小组向他请示。他指示不要放北大学生到外地串联。于是校文革就不给去外地的学生开放行条。

发起“打回老家”的，还有我同班同学张惠泉。他后来和贵州“四一一”结下了不解之缘。8月24日他没走成，9月5日他带着我班大队人马也赶到贵阳。

四、关于“南下串联二队”

这是一支在火车上临时凑集起来的战斗队。它的成员最初一共16个人，除北大外，人数最多的是北京邮电学院、北京航空学院一年级学生，而且大部分是贵阳考到北京的。

在火车上，我们还碰见了中国科学院去贵阳地化所出差的几位同志，年龄比我们大几岁，衣着都挺整洁。他们听说我是北大的，就主动跟我打听北大运动。但说到贵州现状，他们就非常谨慎了。后来，有一位胖胖的、高高的同志单独找我。他讲，他接到朋友的信，说地化所打了不少“反革命”，运动很不正常。他很赞同我对贵州运动的分析、评价。我们谈得很投机，我鼓励他去“煽风点火”！他自我介绍，他叫孙昌德！

快到贵阳，我们这16个人在内部就争论起来了，北邮的学生主张到大学去秘密串联，大字报不要上街，他们的意见占了多数。一下火车，我们窝在候车室，经过争论，商定了先刷大标语；再争论，又商定了大标语的内容。于是一部分人抄，一部分人贴。有几个思想激进的，把大标语贴到了火车站广场的公共汽车上；这些汽车专门接送旅客，往返于火车站和市内之间。公共汽车的司乘员都不敢干涉我们！

那几个贴大标语的，还搭车进城，把标语贴到了大街上。这下子，全城市民都知道北京学生来贵阳串联了！

我们忙活到下午四点过钟，来了几名贵阳医学院“工农红卫兵”的同学，非常热情地邀请我们到他们学校住下了。当晚，我还被邀请到男生宿舍向他们介绍了北大运动。他们讲贵阳医学院的情况跟北大很相似。另外，还有学生被请到“红旗红卫兵”去演讲。这时我们才知道贵医存在着两个观点对立的红卫兵组织。

第二天，我们内部又经过一番争论，大多数人终于认同我起草的大字报《六问贵州省委》，只同意贴到几所大学里去，不同意贴上街。我们一共抄写了三份，决定贵医贴一份，贵阳师范学院和贵州工学院各贴一份；人员也做了分工。

该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是指出贵州省委前阶段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强烈要求省委必须在“六·六”事件中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彻底平反，并向全省人民做出深刻检查。

吃过中饭，我和三名同学，带着大字报，踏进了贵阳师院的校门。学校显得安谧、冷清，大学生们还在教室里自习。我们四处找地方，最后决定贴在校门大路边上的红楼墙上，那里显眼、往来人多。

我们一贴完，就引来不少师生观看、议论；我们也和他们交流起来，他们都显得很谨慎、小心。当天下午，贵阳女中的学生跑到师院，抄走了《六问贵州省委》，很快就将大字报搬上了贵阳大街。贵阳市轰动了！

后来，我们得到了一份《六问贵州省委》的铅印材料：贵州省委加了批判的“按语”，批给全省革命群众批判用的。这下子，“北京南下串联二队”的名声也传出了贵阳市。

随着北京大学生的不断到来，“南下串联二队”也迅速扩大到40多人。我提议改选串联队领导小组，提议由北大生物系61级学生李文为主要负责人，因为原先的负责人北京邮电学院邹某，思想太右，能力不够。那时的选举程序是：先由本人自报家庭出身，政治面貌，再自由推举候选人，民主评议后，最后举手表决。李文是河北人，贫农出身，中共党员，下乡“四清”任工作分团团委书记，很有领导能力，于是以压倒多数当选为负责人。

没过多久，李文又进入了整个贵阳市南下串联队的领导核心，成了主要负责人。

五、我在“九·五”事件中

回到贵阳串联，花费也多，生活费快没了，我决定抽空回家要钱。但又担心不安全，就决定先摸到莲花坡六舅家问问情况。

9月4日晚7时许，天刚擦黑，我刚走到六舅家外面，就有几个人围过来，朝我上下打量。其中有位40几岁的人，戴着帽子，问我是什么人，我说是北大学生。他口气变了：“你什么时候到贵阳的？——是不是来串联的？”我不敢再说真话了：“我刚下火车。我是回家探亲的，不是来串联的。”他又问：“你来找谁？”我说是顺路看看六舅妈张培玉（贵州省邮电医院职工）。他们告诫我不要来串联，就放我走了。

我一进六舅妈家，她就一脸慌张，问我来干什么？一把把我拖到里屋，关上门，小声告诉我：“现在风声太紧！居委会都动起来了，晚上还查夜，提防北京学生来串连。”然后催我快走。我打听家中情况。她说：“你妈没事，天天照常上班。”

我跟外婆打了声招呼，就忙慌慌地走了。我外婆当时快70岁了，解放初期定为地主分子，跟着六舅，在家做家务。我家当时住在贵阳市东山路5号，背后便是偌大的公安厅家属大院。一条土石小道从大院的东南侧门出来，拐向西，爬一个缓坡，便与外环东路的大马路汇合了。我家就在离大路口20来米的土石小道左边。我穿出莲花坡，来到外环东路上。我边走边张望，没发现什么异常。于是放胆往前走，刚到大路口，突然前后左右窜出几个黑影，一声厉喝：“站住！”便将我围了起来，一道手电光照在我脸上。“是张甦！”居民小组长陈顺珍（女，40多岁）叫起来，“我们守你几天了！终于抓住了！”随即她快步上来，和另外一个男子，一人抓住我一只胳膊。居民委员雷莲珍（女，50多岁）下令：“把他押到办事处去！”

记得1964年我因病休学回家，国庆节期间，她两位还叫上我上东山寺庙里巡逻。那时

她俩可和蔼了，但今天全变脸了，显得阴森可怕。

他们六七个人，扭着我，将我押到中东办事处。我一进门，里边的一堆人马上紧张起来。不一会，我被带到正中间办公室。中间靠里摆了张办公桌，后面椅子上坐了位干部，40几岁，有几分威严；他左右两边站着几位，一看便知是街道干部。陈顺珍和押送我的男子依然站在我两边。坐着的干部问我姓名，学校，几时到贵阳的，这次来了多少大学生，住在哪里，都干了些啥。我只要一扯开话题，宣传“革命”，那审讯的干部就打断话，旁边的男人便动手搥头，踢脚，嘴上喊：“老实点！”

那位干部审完了，站起身，就往外走。另外一位民警模样的叫把我押到另一间屋，他们几个人便嘀咕起来。陈顺珍和那个男人又揪住我，将我押到旁边的一间关着窗户的屋子，对我折磨起来，先叫低头，接着又搬进一条高脚板凳，逼我站上去：两腿并拢，低头弯腰。稍不如意，那男的就打。他俩轮番看守我。不时还有干部模样的人探头望一望。

就这样，我被折磨了整整一晚上。

天亮了，他们把我从高板凳上放下来，押到外面。我要求喝水，吃点东西，都被严辞拒绝。过一会儿，陈顺珍拿了顶纸糊的高帽子进来，扣在我头上，换了两个男人扭着我的手，押着我上街了，前后簇拥着一大群人。

走下省府路，来到中华中路。这时，大街上是一队队打着旗帜，呼喊口号游行的人，热闹非常！我被押到中华中路市烟酒糖业公司门口。我站在大街正中，周围是情绪激动的人群，男男女女，呼喊：“打倒反革命，保卫省市委！”“谁反对省市委，谁就是反革命！”突然间，人群分开来，一群人扭着我70岁的外婆进来了：她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子，上面写着“地主分子”；胸前挂着纸牌子，写着“南下串联队张甦的地主外婆”。陈顺珍也将一块写着“地主狗崽子张甦”的纸牌挂在我胸前。昨晚在莲花坡询问我身份的戴帽男子，走到我跟前，说：“不老实，还说你刚下火车！”他振臂呼喊：“打倒地主分子！”“打倒地主狗崽子！”周围的人也跟着喊起来。我也不示弱，也高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革命路线万岁！”他们就使劲搥我的头！

他们又搬来高脚板凳，几个人把我推上去；他们转过来推外婆上去，老外婆摇摇晃晃站不稳，就叫她在地上站着陪斗。这时大街上涌过来一群人，是省京剧团的。一位中年女同志看见了我，就高喊：“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顿时热泪盈眶，感动异常，也高呼：“毛主席革命路线万岁！”“毛泽东思想的阳光一定会普照贵州高原！”当然我又招来一阵拳头！

在我旁边，一大群人正在围斗省话剧团演员胡大舜。他昂头高呼：“毛主席万岁！”四周的人死劲要摁他的头，他拼命挣扎！这些人硬将他打倒在地！他还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大约11点过，居委会的人斗累了，把外婆押走了，我胸前的纸牌子，头上的高帽子也被取走了；我被移交给另一群人批斗。

这是一群厂矿企业的职工，他们押来了几名本地中学生和一名北京来的大学生。我们几个站在中间，工人围在四周。有三个领头的指挥，要被批斗的人交待“罪行”。站在我旁边的是省商校的女学生，十六七岁，叫唐玉莲。她交待说：“我是上街贴大字报被抓来的。”领头的问：“大字报什么内容？”答：“炮轰省市市委的。”“炮轰省市市委就是反革命！知道吗？”“知道了，知道了。”她连连说，又问，“能放我走吗？”领头的说“不行，要接受群众批判。”我们都弯着腰，低着头。我趁没人注意，就对她说：“坚强些，坚强些！”想不到，她居然向那领头的告发：“他不老实，叫我‘坚强些’。”有人立即上来给我几下。问到那位北京学生，他说他是刚下火车的，领头的说：“拿火车票来！”看完后，就去与另外两个人咬了一阵耳朵，对他说：“你赶快回北京！”就把他放了。

我往四周望了望，周围里三层，外三层，都在围斗“南下串联队”学生、本地造反派。“打倒反革命，保卫省市市委！”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贵阳市闹翻天了！

斗到下午三点来钟，批斗的人把我们几个押到市糖业烟酒公司里面。终于让我们坐下喘口气了，还让我们一人吃了碗盖菜饭。公司书记王顶柱，还问了问我的情况。

五点多钟，我们被放走了。大街上人们陆续撤走了。六点来钟，我拖着极度疲惫的身

子回到了贵医住地，一上床就倒头大睡。九点钟，我被拍门声吵醒，门外传来陈顺珍尖利的叫声：“我们来找张甦！”“把他交出来！”

“没有这个人。”我们的同学回答说，把她们支走了。

第二天，李文主持开会，汇总情况，才知道这是省市委经过精心策划和组织的大行动。他们调动了城内城外除学校之外的所有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人数达到十几万，专门围斗北京的南下学生和本地造反派，要把刚刚点燃的革命烈火扑灭下去！

六、南下串联队与省委领导张健民的座谈会

9月7日上午，我和“南下串联二队”的几位同学参加了该座谈会。会议在南明堂省委大楼三楼会议室举行。我们是中间插进去的。会议已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主要是揭发追究省市委领导人策划“九·五”事件的责任，要求省委领导如实向中央报告并作检查。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健民回答说：他刚从乡下回来，一点情况也不了解，怎么向中央汇报？代表们说：那你就代我们向中央发电报。张答可以。于是我自告奋勇起草电稿，当众宣读后，又按代表们的意见作了修改。张健民接过电报稿看了下，立即交给身边工作人员，吩咐马上发出去。隔了一会，工作人员回来说：电报已发出去了，是发给国务院办公室的。我们问为什么不发给党中央，他回答说：我们的电报只能发给国务院办公室，这是规定。

七、我了解的吕彤岩被绑架事件

北大学生吕彤岩是当时铁道部部长吕正操的女儿，1966年8月底也到贵阳串联。“九·五”事件中传说她被不明真相的群众“绑架”了。为此，“南下串联队”写出大字报强烈抗议，闹得沸沸扬扬。

就在9月7日和张健民同志座谈会散了以后，我和省委一位干部交谈，他说：“你们北京串联队很不纯洁。里面就混得有黑帮子女。”我问是谁，他说“你们北大学生吕彤岩，

就是黑帮子女。”还说：吕正操已经揪出来了，是黑帮分子。

我后来在省府路招待所碰到北大中文系同学张卫东，就问吕彤岩的情况。张卫东说：“九·五”事件中，大批群众冲进贵阳招待所，围斗南下学生。吕彤岩和他们辩论，就被一伙人拉到大街上去了，和大家隔开了，一天一夜没回来。我们就怀疑是被“绑架”了。后来那伙人也知道了她是吕正操的女儿。不久，省委就来了部小车，把她接走了，住了一个晚上，9月6日就回来了。

我说省委干部说她父亲是“黑帮”，已揪出来了。张卫东说：不可能呵。吕彤岩和我们一起住，她没讲啊。于是她带我单独见了吕彤岩。我把我听到的一五一十全给她讲了。她没说什么，显得很沉着；对我也很和气。后来听说，她第二天就回北京了。

不久，大字报、小字报就报道了吕正操部长被罢官的消息。这时，“揪出南下串联队的黑帮子女吕彤岩！”的大标语也刷到了贵阳招待所门前的围墙上！

封建专制主义的反动血统论（变种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大棒敲到了吕彤岩身上。没过太久，更加凶狠地敲到了我身上。

八、返京向周总理汇报

“九·五”事件后，对造反派和南下串联队的高压仍旧严重。再加上大专院校学生和部分中学生代表陆续赶赴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贵阳的运动显得冷冷清清。南下串联核心组决定派一个代表团返回北京，向党中央反映贵州文化大革命情况。代表团由李文亲自带队，确定我担任“秘书长”，负责文字工作。代表团于9月11日中午时分乘火车离开贵阳。

我清楚记得，那天火车上非常热闹，挤满了串联队的学生。北大有两个学生带了一名工人，挤到我们代表团所在的卧铺车厢，介绍说：这是一个工人造反派，因为揭发省市委调动工人镇压南下串联队的罪行，遭到单位批斗，现在他逃出来，要到北京去告状。要求我们保护他。我看他，操湖南口音，个子高高的，一对眼睛贼亮。他自我介绍，叫李铁乃。

李文同意了，叫他爬到上铺躲起来。

在火车上，李文叫我起草《贵阳南下串联队北上宣言》，获得一致通过。代表团还在火车上宣读了《北上宣言》。李文又组织代表团商定了“四人汇报”小组名单，逐条确定了汇报内容。最后大家确定我担任主讲，其余三人补充。

9月14日下午，我们抵达北京。李文带着我们到达国务院文革接待站，要求周总理接见我们。下午4点来钟，国务院办公厅来了一名副主任，一名秘书专门接待我们。首先他说，周总理很忙，抽不出身来，由我们两个先听取大家汇报，再向总理报告。那位副主任坐在椅子上，边听边问，不时还用笔记一下，那位秘书只管记。当我汇报说“九·五”事件中贵州省市组织、指挥十几万人围斗南下串联队，他表示怀疑，批评说“十几万？不可能吧。你们说话要实事求是。”我身边一位代表马上就冒火了，站起来，声严色厉反驳他。其他代表也对他一顿批评。他哪里遇见过这种阵势，一时间慌了神，赶快作检讨。我也想不到我的战友火气这样大！于是现身说法，把我在“九·五”事件中的亲身遭遇作了介绍。我还问他，9月7日我们请贵州省委张健民同志帮我们发给国务院办公厅的电报收到了没有，他回答说，收到了，只是不太相信电报讲的情况。我主讲完之后，其余同学也纷纷补充发言。末了，那位副主任再次作自我批评，并保证把大家反映的情况向总理汇报。

我们汇报小组的成员就坐在接待站办公室里等着。到了半夜时分，那位副主任出来告诉我们说，周总理很忙，今晚肯定接见不成了。什么时候接见，要等通知。最后他问了我们留下来的人数，就进去了。又过了一阵子，副主任再次出来，给我们讲：经过周总理批准，欢迎你们几位同学明天上天安门广场的观礼台，接受毛主席的检阅！随即把观礼券分发给给我们，我们心情非常激动！

9月15日下午2点钟。我们几位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广场西侧的观礼台。

当天风和日丽，我站在观礼台上，向前方望去，只见广场上人山人海，红旗招展；不远处，“贵州工学院”、“贵州大学”的旗帜在人海中飘动着，清晰可见。

下午5点20分，在中央领导人讲话之后，毛主席的检阅就开始了！受阅队伍一队接着

一队，从天安门广场经过，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挥动着巨手，广场上响起一阵接一阵“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到了下午7点多钟，两侧观礼台的红卫兵齐声高呼：“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毛主席闻声走到天安门城楼西南角，俯下身来，向着我们，也向着西南方向广场上的人群，挥动着他的巨手，他挥了一遍又一遍。我们激动得热泪盈眶，不停地呼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那时候，我深切地感觉到，伟大领袖的心和我们红卫兵小将的心，紧紧连在一起了！

“九·一五”接受毛主席检阅之后，我们又在国务院接待站等了三天。最后，还是国务院办公厅那位副主任来接待我们，他说：你们反映的情况，我们都如实向总理报告了，总理要我转告你们，你们一定要相信贵州的广大群众和广大干部，要相信他们，依靠他们，要让他们自己起来闹革命。

九、被迫离开贵阳

汇报团成员在京经过短暂休整，于9月21日离京，9月24日抵达贵阳。

在火车上李文召集会议，决定回到贵阳后立即召开一个全市性的汇报大会。接着研究了汇报要点：一是宣读《北上宣言》。二是重点介绍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受周总理委托听取汇报的情况。三是周总理邀请代表团成员登观礼台接受毛主席检阅的情况。四是讲解南下串联队今后的战斗任务。最后定下了作汇报的人员名单，我是其中之一。

回到贵阳，经过两三天筹备，大约在9月27日晚上，在贵阳市邮电大楼前广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汇报大会。但我主动辞去了汇报任务，因为我受到前所未有的人身攻击。

首先，以“贵州省电影管理处革命职工”名义贴在喷水池民族商店大墙上的大字报最为醒目，一是字体大，二是标题吓人：“揪出南下串联二队的黑五类狗崽子张甦！”三是内容也恐怖（因为当时正是反动血统论甚嚣尘上的时候），将我的外公、外婆、舅舅、舅妈、姨爹、姨妈，只要有了点历史问题的，统统有名有姓地列了一大串！比如写道：“舅

舅徐锦林，从小加入国民党反动空军。”其实他是在抗日战争中考入了国民党空军幼年航校，学习飞行技术；1948年底离开国民党空军，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担任飞行教官，为培育新中国空军的第一代飞行员做出了贡献。他培训的学员，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有不少人当上空军师级、团级干部的。

另外，街头上还出现了不少大标语、传单。比如以“贵阳二十一中革命师生”名义印刷的传单就颠倒黑白，说我在贵阳七中读高中时，就是“白专典型”（实际上我在1962年时就被评为“贵阳市三好学生”，出席了“贵阳市三好学生代表大会”），1964年因病休学不与工农兵相结合，而是上东山“同和尚勾勾搭搭”（实际是：1964年9月起我在贵阳市花溪公园参加了十个多月的义务劳动，国庆休假时，参加了街道居委会组织的节日保卫工作，到东山寺庙巡查）。

一看便清楚，这是省市委在幕后策划和组织的官方行动。

但对我在贵阳的亲属造成了巨大压力，也对我造成了极大的心灵伤害。

九月底的一个夜晚，天特别黑。我母亲悄悄来到贵阳医学院，找见我，说：因为我来贵阳煽风点火，不仅亲戚受到牵连，我们的家也被街道居委会带人抄了，她上前阻拦也被打了，所幸她本人是解放军复转军人，才没拉上大街批斗。外婆就脱不了身了，还好，身体没有斗垮。她告诫说，当年土改，凡家庭出身有问题的解放军学员，都不到出生地搞土改。她说：你要革命，就去外地闹，不要来贵阳。

在内外压力下，我不得不离开贵阳了。当时我在贵阳认识了北大化学系63级学生李乾宽、雷祯孝，李乾宽替我写了两封介绍信，让我去找他在重大、川大的高中同学。

我向李文辞行，于10月1日离开贵阳，先到重庆，再到成都。在重大、川大校园，我分别张贴了几十张大字报，揭露贵州省市镇镇压文化大革命的“罪行”。然后于10月中旬回到北大。 ■

2016年元月于贵阳

【资料】

康生批驳北大技物系崔子明等的两封信¹

1967年1月3日

康生致中央文革小组的信

伯达、江青及文革小组诸同志阅：

这是北大技术物理系三个学生来信，他们用“质疑”的手法，来保李洪山、乔兼武、杨勋、杨炳章等反革命分子的。

康生 1/1 .67

康生对崔子明等人两封信的批语

当崔子明等人写到十二月十二日给康生公开信错误之一是“在于当时我们对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时，康生批语：不对，是反动阶级立场问题。崔子明等人认为：“李洪山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跳出来反对中央文革乃蚍蜉撼大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翻不了天”。康生说：“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的小走狗，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翻不了天”，但是你们给我的信完全不是这种观点，而是同反革命分子李洪山、乔兼武、杨炳章反革命言论相呼应，为这些反革命分子叫屈。

当崔子明等人谈到错误之二在于：“对于全国陆续发生的群众斗群众，群众斗学生的问题，我们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和主流”时，康生批语：不对，李洪山等人不是群众，是革命群众向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北大同学批判你们这封反动的信，是正确的，作得对，

¹ 北大技术物理系132班崔子明、席关培、张拯于1966年12月12日和26日两次致信康生，这是康生对两信的批语。

作得好。

当崔子明等人谈到：“当前桥和船的问题在有些时候也会成为主要矛盾。尤其在目前运动正向纵深发展时，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万万不可小视。我们不仅仅要敢于革命，而且要善于革命”时，康生批语：你们不仅仅是反对革命，而且是破坏革命。

当崔子明讲到，“他们由于刚刚串连回来没有什么事可做（当然我们主观能动性也发挥得不够）”时，康生批语：你们反革命的能动性发挥得很够。在李洪山等反革命分子被镇压后，你们还要垂死挣扎，还写这样的反动信来进行反扑。崔子明等人说：“他们在信中发了些牢骚，这是极不严肃的。”康生批语：可耻的狡辩。崔子明等人认为，公开信在“客观上使亲者痛、仇者快，影响很不好”时，康生批语：这正如来信所讲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跳出来反对中央文革，乃蚍蜉撼大树，没有什么了不起。崔子明等人对同学们的批判感到“我们目前所受压力很大，几乎抬不起头来”时，康生批语：好得很，这对你们是很好的教育，不是“几乎”，而是要将一切反动言论使它永抬不起头来。崔子明等人说：“我系文革的一位副主任则说：现在我认（为）你们是人民内部矛盾，继续下去就是敌……（康生在省略号之处加了“我矛盾”三字）谈到这儿，他把敌字咽了下去，改口道，继续下去就是对抗性矛盾。……”时，康生同志批语：讲得对，不应该咽下去！应该如实的讲。

崔子明等人说：“有一些人叫我们‘反革命’，‘跳梁小丑’，或许大多数同学在开玩笑”时，康生批语：他们不是开玩笑，而是严肃的阶级斗争。崔子明等人要求同学们对他们的态度能否缓和一下！康生批语：对错误为什么要缓和呢？当写到一位哲学系五年级的同学批判他们时，“我们还是陪着笑脸听了他的意见，心情您老是可以想见的。”康生批语：我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同你们所说的是相反的。

崔子明等人说：“我们的信件（经同学建议成了公开信）的观点在认识上有错误，起了很不好的作用，我们感到很痛心。”康生批语：欢迎自我批评，但是要诚恳的、坦白的、革命的，不是玩两面手段的。你们的信原来就是准备公开张贴的。给我的信写明是十二月十二日，公开信贴出也是十二月十二日。崔子明等人问：“我们的信件究竟是不是反革命信件？”

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康生批语：是大毒草。

崔子明等人在信中写道：“我们有了想不通的问题可以不可以反映给你们？对中央文革的同志们有意见可否提出？（当然意见不一定正确）认识上有错误就一定是立场问题吗？”康生批语：对中央文革小组有意见，完全可以提出，也完全可以批评。我们对于任何批评，不管是对的或是不对的，都愿倾听。但是你们的来信，一不是反映情况，二不是提出意见进行同志式的批评，而是伪装成提意见进行商讨的样子来，（1）反对对彭、罗、陆、杨进行斗争，（2）歪曲两条路线的斗争，（3）抗议对李洪山等反革命分子的镇压，（4）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和陈伯达、江青同志，（5）打击革命左派，包庇反革命分子，（6）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维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7）反对无产阶级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绝对不允许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

崔子明等人写到：“我们提出的问题看来还有一定的代表性，您的指示对于我们和持有我们同样意见的人都有好处。”康生批语：大概能代表李洪山、易振亚、万会秦、赖锐锐、伊林、乔兼武、杨炳章及《虎山行》等一小撮人。

崔子明等人对康生说：“上次给您的公开信就是很不认真地写出来的。”康生同志批语：不，很认真地写的。不要用谎言去掩盖错误。

最后崔子明等人要求康生说：“我们急切地等待着您的答复。”康生批语：对此信的批语，就是对你们两次来信扼要的回答。■

康生 3/1 67

【资料】

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北京大学代表谈话纪要

1967年1月3日

地点：人民大会堂

参加接见人员：陈伯达、江青、康生、王力、杨成武等

北大代表： 聂元梓、夏××等五位同志

开始时康生同志拿着一叠信，对大家说：北大技术物理系有人写信给我，讲到乔兼武、李洪山、杨炳章等，意思是替他们伸冤，说有大字报批判他们，他们感到有压力，抬不起头来，你们知道吗？（大家讲了实际情况，并说了自己的看法）

陈伯达：今天听听大家意见，你们说说北大情况。（大家开始汇报情况，以下按问题整理了几方面，有的地方可能没按讲话次序）

××：有人说，聂元梓搞刘邓，你们北大井冈山应与她合作，这个传说不对。聂元梓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我是讲要革命的同志和她合作。我讲话时，周围就有三个同志，他们不承认北大井冈山是三司的，三司主要领导人都不知道，据说只有一个组织组就糊里糊涂搞进去了。

（问到10月20日江青是否接见过北大井冈山负责人魏秀芬时）

江青：最近造谣很多，我无须辟谣。（说到江青接见杨勋时）

江青：那时很乱，有很多人在国务院找中央文革，不知怎的，就把杨勋也找来了。上次我讲同一个反革命小丑讲话，我都不想说她的名字，这个人就是杨勋。（说到军训问题时）

陈伯达：你们五、六日就可开始。

杨成武：要突出政治，学毛主席的文章。北大、清华、北航、地质、男二中、男廿五中六个单位，搞试点。

江青：军训两周，以后家里经常保持两千多主力，其余下厂、下乡，军训期间可以搞

大斗争，大批判，大改。军训后，可以搞小斗、小批、小改，北大可以初步搞点斗批改。等到春暖花开，人家又来了，你们北大自然是重点。毛主席支持过你们，你们自己考虑一下，能不能自己搞？……我们不当工作组，最好你们自己搞出点经验来，哪怕教训也好。

（说到有人不愿意回来，特别是与我们观点对立的人，例如孔繁、杨克明等人不回来时）

江青：军训必须都回来，否则由他们自己负责。他们“虎山行”也回来，编队时可以拆开，不要让他们在一起。

（有人问能否以战斗队、战斗团为单位参加军训时）

江青：你们内部左派都应拆开，不能自由结合。王任重就主张自由结合，这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到宗派主义。

陈伯达：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王任重的观点，要破这个东西。

江青：你们军训可以过抗大式半军事的生活。（接着江青讲她自己在延安时的生活）

江青：军队可以和你们一起搞，军队的连、排长可以给你们当营、连长。（谈到不同观点人的关系时）

陈伯达：对他们（指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如果放弃旧的观点，你们不要再抱成见，要欢迎他们。（谈到王任重、孔繁、张恩慈、杨克明问题时）

江青：中央文革没有派，王任重到北大联系，王任重是作为北京市委的顾问，那些联络员，也是他自己派的，他实际上是包打天下。清华也是这样，他想拖我们犯错误，关于北大停止斗黑帮，搞选举，王任重没告诉我们。

陈伯达：按我的意思，暂时停斗黑帮，搞选举，选完再斗也不坏，但王任重这个人真是两面派，你（聂元梓）选，他说你争位置。王任重说你容不下人，我们是为了保护你，让王任重对你说应气量大一些，可是王任重对你只说好话，背地却对孔繁、杨克明说你的坏话。

江青：你们八·一五开的斗争陆平大会，当时我们不知道，第二天我们知道后，我们

说这个大会开得好，而那天王任重开的打死红卫兵的小流氓的会是坏的。可是王任重却硬说八·一五大会开得不好，王任重完全颠倒黑白。我们能作证，当时我们说你们那个大会开得好。（谈到关于校文革时）

江青：你们学校刘邓路线具体表现在孔繁、杨克明身上，王任重耍两面派，可厉害了。王任重不是一般执行反动路线的错误，而又耍手法，耍两面派。（谈到张恩慈时）

江青：张恩慈这个人不正派。

王力：张恩慈自己讲支持孔繁、杨克明。

江青：自从张承先被赶走后，王任重包揽一切，我们不了解北大情况。（大家又继续谈了北大的情况）江青同志接着说：这些过程我们也不知道，你们可以谈，可以写，我们很关心你们北大。

（谈到关于平反问题时）

江青：你们要揪张承先？（大家答：要揪）

江青：揪回这个家伙，不揪怎么得了？不揪不能平反。你们六·一八有多少人被打成反革命？自杀的有多少？清华有一个统计材料，是工作组搞的，现在成了我们斗他的材料。

聂元梓：我当时刚从医院出来就迎接了“搬开聂元梓，北大才能乱”的大字报。

江青：不是迎接是遭遇。

××：那时你们不应该承认这些大字报是革命的大字报。你们北大从六月一日，可以说从五月底以来到现在，已经有五、六个月的时间了，可以总结一下，其中还有些坏蛋捣乱，你们可以适当地搞些斗、批、改，总结出来，哪怕是一点教训也好，回去自己研究一下，然后就搞起来。■

【资料】

陈伯达、江青同志做重要指示

1967年1月16日

一月十六日晚，陈伯达、江青同志接见了我校革命师生代表聂元梓、孙蓬一，并作了重要指示。

陈伯达在谈到王任重问题时说：王任重过去在中央文革，住在哪个楼，哪个地方我们不知道。王任重和刘志坚住在一起，搞了很多鬼名堂。要拉江青同志犯错误。有一次中学生开会，辩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本来说开座谈会，结果开了一个大会，来了许多人，什么刘少奇的刘平平也混在里面。硬拉江青去，我们发现王任重不正当。

王任重在北大搞，中央文革小组不清楚。发现王任重在北大不合适，让他走掉了。

伯达、江青同志讲，王任重很坏，很多作法不是共产党作法，而是国民党作法，特务作法。王任重是中央叫他走的，他走后给关锋写了一封信，我们根本没有回信，因为回信会提高他的身价！

王任重当着江青同志面讲了孔繁、杨克明很多好话，讲了聂元梓同志很多坏话。江青同志问：为什么你不找聂元梓谈谈？王任重答：我不能找她。（其实他当着聂元梓同志面尽说奉承话。）

江青同志对聂元梓同志说，我们要保你，从政治上关心你，帮助你。孔繁到哪里去了，你们要揪他！

聂元梓同志问到，来北京吃饭是否主席批的？江青同志说：不知道！这也是糖衣炮弹，到北京来什么人都有。

聂元梓、孙蓬一同志汇报我校按军训编制下厂，去宣传，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时，伯达、江青同志很满意，认为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指出到北京来

的大多数是工人，对他们要进行宣传、动员。但是也有少数坏蛋，要分化瓦解他们。

聂元梓同志汇报说，有一些工人反映，有些学生尽当指挥，不当学生，工人依靠不了学生，要同学下去学习。工人起来，自己干！伯达同志讲：有主人翁思想，很好！这样学生可以当学生了。一个工厂不能去很多。要计划安排一下，不要下去乱跑一气。第一机床厂可去看一看，现在少数派已经把时传祥的捍卫团打败了，掌权了。

当汇报到有些同学要求去外地时，伯达、江青同志指示，现在不要去外地，可以在北京下厂、下乡。北京是打响文化大革命第一炮的地方，现在有些落后了！因此搞好北京运动很重要。

学生下乡不要搞人海战术，进工厂同市委联系一下，下去不要指手画脚，要当学生。一定要帮助北京市委搞好下乡工作。

江青同志说：北大的风格不是“过”了，而是太温了。希望注意克服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极端民主化。希望北大同学能做出样子来。■

本刊说明：以上资料系从胡宗式、章铎寄赠本刊的《毛主席的新北大》（“新北大公社火车头编辑部1967年11月”编）一书中选摘的。本刊删去了“康生同志”中的“同志”二字。

【读者来信】**1. 庄菁瑞、佐燕、郭力、季烨谈丛立新《非正常死亡》一文**

文革非正常死亡人物写的真细致，作者丛立新其功甚伟！（荷兰 庄菁瑞）

收到此期的《记忆》。看到北京师范大学的文革非正常死亡等内容。我也一直关注建国后各个高校在政治运动冲击下的史实。收到此期文章，受益无穷。不胜感激。（曹佐燕）

第154期收到。我看完了北师大非正常死亡调查，资料难得。（郭力）

154期收到。其中丛立新《文革时期北京师范大学非正常死亡调查》一文，我感觉好，她做了扎实细致的工作，做好些年，既有计划又切实实施。好！向她学习！（季烨）■

2. 冯永光转来两封读者来信

我们都亲历了那个年代，有着共同感受。《记忆》为文革留下永远的印记，告诉我们后代一些在历史书籍上很难见到的真相。希望有共同经历的人能够正确面对这段历史，让刚刚逝去的历史不再被扭曲。接受文革教训，让历史不会重演，这可能是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

《记忆》刊物是一部关于文革事件的珍贵史料，自创刊以来已发表了151期。每期的发表都倾注了创刊者及撰稿人的心血和辛劳，实属难能可贵。罪恶深重的十年浩劫，我们都是亲历者。《记忆》中的回忆录都会引起读者的共鸣！感谢《记忆》刊物的精英们，你们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践行者，是有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志士仁人。■

3. 越人谈不平的林彪的“四大马屁”之文

149期不平兄关于林彪的《四大马屁》一文，个人有些不同意见，林彪的拍马屁无疑是他个人历史的污点，但历史的复杂性在于，林的这种做法在党内不是孤立的，而且对于相关史料的解读最好能够全面一些，这样也可以有效避免国内党史研究著作中选择性运用史料带来的种种陷阱。

之后看到151期不平兄文的第二部分，知道他的七千人大会部分之前登的还不是全本，所以在这里先就不平兄文的庐山会议部分谈一点看法。

关于庐山会议，不平兄说林彪讲的“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是为批彭定了调子，这种说法有合理之处，但并不全面。庐山批彭，有一个重要的定性在林讲话中并没有表达出来，那就是毛后来提出的“彭在历史上最严重的是参加高岗集团”。早在7月31日的常委会上，毛就指彭在“高饶事件”中陷得很深，在其8月4日写的一份批语上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组成了反党集团，而且“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毛在8月11日下午的大会讲话上更对彭德怀提出“是高饶联盟，还是高彭联盟”的严厉指控。（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8、224-225、288页。）

对于这一指控，根据李锐的书，庐山会议上除了毛之外，提的较多的是刘少奇，8月1日常委会上刘讲话，就提到“高岗事件前，（彭）讲了很多对我不满的话”。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庐山上对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大肆批判之际，庐山下也在进行着一场秘密调查，此前被定性为高岗反党集团成员的原中共东北局的几个负责人（张秀山、张明远等）被紧急召到北京，他们到北京后被告知有一个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是高饶反党联盟的继续和发展。张秀山等人被要求积极揭发彭德怀的罪行，包括彭德怀与高岗的关系（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36页；张明远：《我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410页）。而高岗之妻李力群这时也遭到软禁，除了要她交代高岗与彭德怀、黄克诚的关系外，某天夜里还将李接到彭真家里进

行查问，当时在场的还有中组部长安子文和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彭除了向李力群查询高岗与彭德怀的关系，还提到高岗和陈云、林彪的关系很好，“你好好想一想，他们在一起都说些什么”。

李力群遭遇如此审查，十分害怕，一直流泪，却说不出什么。（赵家梁、张晓霖：《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大风出版社2008年版，第259页）。另外，在庐山会议后向各级干部传达关于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决议时，也着重强调了这一点，如指控彭德怀和高岗结成彭高联盟（《李井泉同志传达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决议的报告》（1959年8月30日），转引自钟延麟《文革前的邓小平：毛泽东的“副帅”（1956-1966）》，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6页）。而上海有干部在聆听中央关于彭德怀问题传达后也在谈认识体会中将彭与高饶联盟明确挂钩：“听了反党集团事件，开始很吃惊，但仔细一想，联系过去高、饶反党集团的问题也就想通了。”“彭是高饶反党联盟的重要成员之一，中央保护他过关，还让他担任这么重要的工作，他不但不改好，反而继续反党活动，真是太疯狂了”（《上海市委关于市委扩大会议情况给中央的电话汇报》（1959年9月2日，转引自钟延麟《文革前的邓小平：毛泽东的“副帅”（1956-1966）》，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7页）。

即使在彭德怀获得平反之后，邓小平在1980年3月19日的讲话中明确提到“高岗又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个大区的支持，因此晕头转向……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也得到了彭德怀同志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候六个大区，他得到四个大区的支持，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西北是彭德怀同志。”（张明远记录《邓力群传达邓小平讲话》，赵家梁、张晓霖：《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大风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页）。对于彭参加高饶联盟的定性，毛在多年之后依然念念不忘，六五年九月和彭谈话时，毛在临别时忽然对彭讲：“你在中南海游泳池畔对我说过要斗刘少奇同志，恐怕你是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吧？”（史云：《张春桥姚文元实传》，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303页）。

由上述史料可以看到，所谓彭参加高饶联盟是打倒彭的重要定性，但林和此定性却基本无关，究其原因，和林在高饶事件中是所谓被高岗“假装赞扬”的“另外两个中央领导同志”之一（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据赵家梁和张明远记录稿整理，《半截墓碑下的往事》，第17页。）有不小的干系。而刘少奇在高饶事件中所处的不同地位，是刘及一些相关人士在批彭时积极把彭和高饶联盟挂钩的重要原因。

关于七千人大会，本来也只想写一段，但梳理史料后感觉要写的内容不少，所以打算整合好再请不平兄批评指正。■

4. 岳瑞民关于《北京师范大学文革大事记（征求意见稿）》的两点想法

很显然，编辑所收集的资料太少，缺乏权威性（谁人或者什么是“权威”？我也不知道），所以《意见稿》不能尽如人意，就在所难免了。

1、很多大事没有记载。仅举几例：

“6月14日 孙友余做报告：形势迅猛异常，左派力量占绝对优势……”。什么是“左派力量”？没有说明。“保守组织红卫兵师在此前成立，人数多达千人。”为什么叫“保守组织”？没有说明。而且对此组织的成立、活动和解散等情况没有丝毫交代。

“压制革命群众对‘五一六’的揭发斗争”。什么是“五一六”？文中没有交代。“毛在人大会堂召见包括谭厚兰在内的五大领袖”。这是重大事件。但没有更详细的披露。

2、对文化大革命的定性，中央早有定论。所以，如果将文革史写成光荣史，显然是不允许的。如果写成赤裸裸的罪恶史，恐怕会招致很多麻烦。但是，也不可以写成两派斗争史。因为无论哪派，其实都是被提线操纵的“木偶派”！我想最好写成事实史，或者叫编年史，就是以时间为顺序的流水账。■

5. 蒋健正误

本期94页的“真是比正确更重要”应该为“真实比正确更重要”。■

6. 赵惠中纠错

我写的《夜访金永龄》一文，我的结尾原稿是：蒋锡久 1972 年毕业后曾在湖北省某重点中学任教，退休前是华中科技大学护理系副教授，也是该校的围棋选修课教师。你们以为我写错了，把“护理系”改成“物理系”了。华中科技大学前身是华中工学院，像北医并入北大一样，华中科技大学把武汉的一些医学院并进去了。蒋锡久是从医学院并入华中科技大学的，后来是护理系。■

7. 刘明评《记忆》154 期

《记忆》154 期北师大第二辑。我感觉这一辑比上一辑内容更加丰富而充实，有更多的北师大同仁参与了回忆，相信未来第三、第四……会更有力度。下面仅就两则主要篇目谈点读后感。

从立新教授的《非正常死亡调查》，详细记录了 45 名师生员工的姓名、死亡时间地点、遇难经过、身份简介，调查难度很大，工作做得扎实，令人敬佩。通过比较发现：1、文科比理科死的人多（23：8），联系到反右等历次政治运动中哲学社会科学学者比科学技术工作者被冲击更加深重，证明文科教研的确存在更大的风险；2、我所在的物理系是理科各系中死亡人数最多的（数理化生地为 1：6：1：0：0），联系到物理系学生在各派中活跃分子多，被整肃的学生也多，是否说明当年物理系的运动更加惨烈？3、各单位中，女附中死亡人数最多（和中文系相同，各为 8 人），尤以卞仲耘校长之死最早最为世人关注，说明女附中确有其独特之处，有必要作为个案进一步探究。

韦陀先生的《文革大事记》梳理了北师大文革初期运动发展的基本线索，列举了主要人物和事件，给未来的工作打下了基础。但我感觉内容和文字都比较粗糙，需要进一步充实和加工。作者好象是中文系的，在对师大内部各部门的记事中，中文系占的比重过大；在师大校内与校外事态的记事中，校外占的比重过大。总之，师大文革的主线不够突出。

这些都不可归咎于作者，编一部《文革大事记》，难度太大。一是许多关键人物走了、老了，但思想障碍仍在，在世者之间隔阂也没有消除；二是已经过去了50年，大量文献资料流失，要获取足够的资料，若没有官方的配合，依靠民间收集，困难很大，只能慢慢来。

《文革大事记》有些细节的差错缺失。例如：

第82页 8月20日张建旗、陈立被揪出的原因？

第83页 物理系的郑云云，不对。是中文系的。

第86页 伊林、涤西《公开信》，刘中柱、杨以鸿大字报，没说清楚。

第87页 12月20日 李文博、李世取被抓原因，没说清楚。

……

以下根据我的记忆，写下一点史实，为修订《大事记》提供素材。

1、关于程今吾。文革伊始，程今吾就成为被打倒对象，有其内在原因。程于1962年就任北师大党委第二书记，副校长。此前任中宣部教育处长、高教处长。当时校长是著名历史学家陈垣（1952-1971任职），第一书记是刘墉如（1957-1964任职）。我1962—1968年在校期间，只在北饭厅远远地见过陈垣一次；而刘墉如则因为在家养病，从未与学生见过面。所以这些年里，就是程主政。在当年的形势下，彭真、陆定一已被打倒，7月27日，康生在师大直接点名：“程今吾是彭真、陆定一黑帮的亲信。”程在劫难逃。

6月初，北师大校党委被打倒后，我和一个同学曾经走访过刘墉如，目的是从他那里搜集点程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材料。我们只听到刘墉如抱怨，他虽因病，不能主持工作，但毕竟是第一书记，程今吾却大权独揽，从不与他通气，因此他对党委工作不甚了了。刘的态度有代表性，当时的副书记、副校长马建民、薛迅等，个个自身难保，不能或不敢帮程说话。

在这样一种党内上层高压，同事划清界线，下面群众炮轰的形势下，程的命运就注定了。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无论是工作组还是革委会、工宣队，程都是重点批判打倒

对象。从66年6月起，病中的他不仅不给治疗，反而遭到几十上百次批斗，1970年5月病逝，终年61岁。

2、关于通宵大辩论。记得自6月23日谭厚兰贴出反工作组大字报后，校内保工作组与反工作组两派就形成了严重的对立局面，大字报辩论已嫌火力不足。于是就发生了7月初（具体日期记不清了）的东饭厅通宵（晚8时至晨4时）大辩论。几十名各系师生轮番上台发言，人人手持语录，给对方上纲上线，火药味十足。结果是势均力敌，打个平手。这可以说是文斗的极致，师大历史上空前绝后。

3、关于林杰插手师大运动。谭厚兰等在6月1日贴出的指向校党委的大字报，6月23日贴出的指向工作组的大字报都是在林杰指示下撰写的（此前谭是保工作组的），林杰系谭的后台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我当时是持保孙友渔工作组立场的，所以对林有气。大约是通宵大辩论后的某一天上午，我和几个同学在大操场与北饭厅之间的马路上，迎面遇到行走中的林杰。我就运用被认为时髦的《语录》，上前当面指责林：下车伊始，不做调查研究，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做指示，操纵师大运动，如此不相信群众，完全违背主席思想。他当时要急于去见什么人，没有与我争论。

不久之后的7月27日晚，陈伯达、康生、江青率领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光临北师大，几位要员先后讲话。康生居高临下地指责：“在孙友渔的反党活动中，他们不去反对彭真黑帮，而把矛头指向党中央《红旗》杂志社，指向林杰同志。你们看，今天我把林杰带来了。同学们，林杰是师范大学的毕业生，是个好学生，是你们的好同学，却被孙友渔说成是林杰同志支持右派学生。还有人讲林杰同志有后台，后台是谁呢？后台是关锋，这里面有一条线索说关锋的后台是陈伯达，是我！你们来审查审查，我们算不算黑帮？算不算黑线？”

康生此话一出，我心中一惊！自知作为保工作组，反（批评）林杰，血统又非红五类的学生，罪责难逃！再不可轻举妄动！此前我还是个积极分子，大字报写了不少。此后，我就不敢写大字报了，任何派别也没有参加。直到一年后的67年8月，林杰随同王力、关锋一起倒台，我才卸了这一包袱。但在毕业时，系里班里当权的文革小组还是抓住我一

些不满林彪、谢富治和反感谭厚兰的言论，组织对我的批判，并将我分配到边远的农村公社，以示惩罚。

4、关于李春秋大字报。大约是在66年9月上旬，政教系教师李春秋贴出了大字报《拥护还是反对谭厚兰等革命左派是真革命假革命的分水岭》，引起多数派的红卫兵师与少数派的井冈山战斗团之间激烈的大字报论战。当时反对大字报的声音还是占上风，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央文革对谭厚兰造反派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红卫兵师江河日下，逐渐销声匿迹直到土崩瓦解。这张今天看来荒诞不经的大字报在当年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幸而言中。

我曾有写日记的习惯，但在恐怖的1966年，因为已经觉察到有人在偷翻别人的抽屉，偷看别人的日记笔记等隐私材料。我怕惹火烧身，将十来本日记统统付之一炬。当下手头完全没有资料，全凭残存的记忆，写下了印象最深的点滴往事，错讹难免，仅供参考。■

2016-5-9

8. 胡拾音部分修正补遗北师大文革大事记

《记忆》154期“北京师范大学文革大事记”中，将发生在1967年的事误植到了1966年。《大事记》中的8月14日所记的钢院延安公社、地质东方红的内容，8月18日和8月20日所记的五一六的内容，以及8月21日斗余秋里一事都应该发生在1967年。另外8月22日整段说批评中国赫鲁晓夫——不是当时的提法。

北京高校首先给刘少奇贴大字报是清华大学66年8月24(?)，起因是由工作组的王光美联系到刘少奇，但大字报贴出后，立即遭到了清华校筹委会和中学红卫兵的打砸。当时中央文革的指示是不能公开点名刘少奇。66年十一前后才在高级党校出现了关于刘少奇的大字报。而谢富治和丁国钰，这时并没有管高校的事(67年2月，高层才确定叫谢富治筹备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市革委会是1967年4月20日才成立的)。

9月18~20日张春桥组织的4次座谈会，讨论周恩来的问题——这有出处吗？据我所知，张春桥很少过问北京学生运动。另外王大宾当时还不是地院的主要头头。■

【本刊声明】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并告以个人的真实信息，收到后给编者反馈者，皆可免费获得。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举报邮箱：dw66778899@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责编：慕太冲

本期校对：吉 康